政治科學論叢／第 108 期／民國 115 年 6 月／頁 55-100

# 天下的越南與越南的天下：
## 越南後黎朝對外交往之關係與權力研究*

陳思宇**、張登及***

## 摘　要

「天下」是古代東亞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概念。現有關於「天下」的研究，大多將重心置於中國或是其他居於區域核心地位的大國，忽視了體系內的其他國家。據越南史書記載，越南並非完全服膺以中國爲中心的天下。越南不僅長期以「天下」指代自己統治的領土，還以「天子」或「聖朝」的名義，與其他國家建立關係，懲戒沒有扮演好「藩臣」角色、未及時向越南朝貢的東南亞國家。如此一來，越南既是向中國朝貢的「天下的越南」，又同時是接受其他國家朝貢的「天下的核心」，形同建構了中國之外的「越南天下」。古代越南如何同時應對「天下的越南」並經營「越南的天下」？值得探究。

本文以後黎朝時期的越南爲研究對象，經由權力平衡與關係平衡的途徑，引證歷史資料與文獻檔案，分析越南如何經由「權力」和「關係」，建立並維繫不同於中國的天下體系。本文發現，越南在對外交往時更容易與「前置共性」多的國家確認共性，而一旦確認共性，雙方將優先使用「關係平衡」方式解決衝突。但當共性面臨危機或無法確

* DOI:10.6166/TJPS.202606_(108).0002
本文係國科會計畫 NSTC 114-2410-H-002-142-MY2 及教育部 114L-900302 之部分成果，作者們並曾以 “Relations Before Power? Balance of Relations and Balance of Power in Vietnam’s Foreign Interactions (1009-1885)” 爲題，發表於國際政治學會 2025 年年會（IPSA 2025, July 12-16, Seoul），謹對本刊匿名審查人、IPSA 評論人的指正與國科會等的支持表示感謝。

** 廣州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後研究員，E-mail: stevenchenruc@gmail.com。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通訊作者），E-mail: tchang@ntu.edu.tw。

收稿日期：114 年 1 月 21 日；通過日期：114 年 6 月 23 日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認共性時，越南也更常施加強權政治於實力小於越南的國家。相關發現不僅有助於理解古代東亞國家的國際關係，亦有助於構思當代國際體系裡，權力不對稱格局中的中小行爲體之外交策略。

關鍵詞：天下、越南外交、中越關係、關係平衡、朝貢體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壹、緒論

「天下」是研究古代東亞地區國際關係的重要概念，尤其隨著中國的崛起和印太局勢的變化，人們越來越關注與天下密切相關的古代東亞國家間的歷史互動，希望從歷史中尋找瞭解現代局勢的線索（吳玉山，2018，頁 5）。因此無論是中文的天下研究（趙汀陽，2016；榮劍，2023），還是英文的 tianxia (Bai, 2020; Bell, 2017; Callahan, 2007) 或 all-under-heaven (Wang, 2012)，或是與天下密切相關的朝貢體系與秩序研究（張登及，2010，頁 34-49；張登及、陳瑩羲，2012；Chang, 2020, pp. 305-319;Hobson & Zhang, 2022; Kang, 2010），主要都是從中國中心（Sinocentric）的天下出發。即便有學者提出美式天下（Babones, 2017）或美國朝貢體系（Khong, 2013）的論述，研究的重點仍是居於核心地位的大國，忽視了天下中的中小國家在此種體系與秩序中運作的特點。

作爲中國中心的東亞天下的重要成員，越南曾長期維持與中國的朝貢關係。[1] 自丁部領獲封「交趾郡王」以來，越南僅在十五世紀初被明朝短暫統治 20 年，其他時間都是獲得中國承認的獨立國家。與中國類似，自居「天子」的越南統治者常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天下」一詞，如陳聖宗在南宋咸淳 4 年的春節宴席上發表的「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的感慨，便是典型例證。[2] 越南歷朝政府文書同樣頻繁提及「天下」：如「赦天下」、「詔天下」、「天下一統」等。在對外交往中，越南常以「中國」或「華夏」自居，而將明清等中原王朝稱爲「北朝」乃至「賊」。[3] 至於周邊的占城、哀牢等國更

---

1 清嘉慶 7 年，清冊封阮朝君主阮福映爲越南國王，越南（Việt Nam）從此成爲該國的正式國名並沿用至今。在此之前，該國通常被稱爲「交趾」或「安南」，君主封號也大多與此有關，如「交趾郡王」、「安南國王」等。儘管在本文所討論的後黎朝時期，作爲國號的「越南」尚未出現，但爲兼顧閱讀便利與概念準確，本文在未作特別說明的無歧義語境下，統一使用「越南」稱呼李、陳、後黎等政權以與中國對應。當可能存在歧義或引述原文時，本文使用李、陳、後黎等朝代名或交趾、安南、阮主、鄭主等具體名稱指稱各行爲者，以示區分。

2 出自《大越史記全書・卷之五・陳紀・聖宗皇帝》。

3 《大越史記全書・卷之十・黎皇朝紀・太祖高皇帝》記載，後黎朝開國君主黎利指責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被視爲需要向「聖朝」越南朝貢的「蠻夷」。北宋宣和元年，越南李朝君主李仁宗還曾因麻沙洞「忘其歲貢」而在龍墀「會天下軍人盟」以懲罰未朝貢的「藩臣」。[4] 在這些歷史紀錄中，「天下」既代表越南朝廷及其統治的土地，也指代越南所理解的世界，還包括越南統治者對世界秩序的想像與安排。如此一來，越南既是需要向中國朝貢的「天下的越南」，又是接受其他國家朝貢的越南的天下的中心，事實上建構了中國之外的「越南的天下」。

本文認爲關於中國的天下秩序與朝貢體系之既有研究，大致可分「關係」與「權力」兩種途徑。從文化理念或倫理規範的角度出發的研究，是爲「關係導向」的研究。此導向的研究一般傾向認爲東亞各國受儒家名分關係的文化理念影響，多優先使用和平方式而非戰爭手段解決衝突。即便居於體系核心的大國，也較少濫用權力優勢逼迫特別是文化理念相近的小國（Kelly, 2012），因此整個東亞體系呈現與歐洲不同的長和平特徵（Kang, 2003, 2020; Kang et al., 2018）。而足以驗證文化理念有其作用的案例，亦所在多有（張登及，2023，頁 256-259；葛兆光，2015）。甚至有研究認爲「天下」是「非戰」、「德化」的和諧世界（王小紅、何新華，2014，頁 163）。另一方面，基於權力的現實主義研究，則認爲所謂「天下秩序」，主要還是依賴物質權力維繫。即便中國王朝尊奉儒家規範，但在對外策略仍受到權力結構的制約，可謂「陽儒陰法」，儒家規範經常不是優先且必要的（朴炳培，2022；Meng, 2023; Wang, 2010）。所以總覽東亞各國國際關係史，理想中「協和萬邦」的天下並不存在；無處不在的強權政治，是繞不開的重大問題。看來理念上的國家間關係與物質結構中的權力，兩者都不宜貿然排除，且越南的天下觀又與中國存在差異，因此本文企圖結合這兩種角度，分析文獻後提出具體假設，以回答以下研究問題：前現代越南如何同時應對「天下的越南」並經營「越南的天下」？

爲回答上述問題，本文選擇越南後黎朝作爲研究案例。作爲越南歷史上傳承時間最久的朝代，後黎朝曾分別與文化親疏有別的明、清建立關係，

明朝軍隊入侵越南時曾使用「賊在中國」的表述。此處的「賊」指的是明朝，而「中國」則是越南。

4 出自《大越史記全書・卷之三・李紀・仁宗皇帝》。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並與周邊的占城、哀牢等密切交往。本研究分爲以下部分進行。首先，作者們將回顧現有的天下研究，並在此基礎上提出基於權力與關係的越南天下秩序的構想。其次，作者們將提出同時基於權力和關係的研究假設，分別藉由越南後黎朝時期各勢力與明、清以及占城、哀牢、眞臘等國的案例追蹤進行驗證。最後，本文將分別對比後黎朝越南與大小國家交往時的差異，討論關係與權力如何影響越南運作其對外關係，試著將古代案例的經驗，延伸到現代國關的研究之中。

# 貳、文獻回顧

## 一、天下的範圍、天下體系與秩序

「天下」是古代東亞國家普遍熟悉的概念，至今仍是現代中文的常用詞彙，含義豐富而複雜。日本歷史學者渡辺信一郎（2003，頁 2-5）對於天下秩序的研究便源於其在北京見到的名爲「天下一品」的麵館；此處的天下顯然無關政治。正因爲天下的複雜含義與其在現代中文中的多樣用法，許多研究雖然聲稱其研究對象爲天下，但實際探討的內容並不一致。尤其當天下被譯爲英文時，all-under-heaven 的譯法更是被質疑無法精確傳達天下的本質，甚至被認爲是不正確的翻譯。[5] 爲確保用語準確和概念清晰，本文有必要在具體討論前梳理並釐清「天下」的內涵與範圍。

「天下」最早出現在何時？張其賢（2009）藉由對歷史古籍的梳理，認爲最晚在西周時已經出現天下的概念。春秋時期，天下出現的頻率逐漸增加，並最終在戰國時期成爲常用詞。隨著社會發展和政治變化，天下在不同時期的含義也不相同。起初，天下的含義大致有三種：天主宰的人世、周王國各諸侯統治的範圍或該範圍與周邊地區的總和。後來，天下逐漸演變爲狹義的中國與廣義的世界，前者僅指中原王朝，而後者則是中國與四

[5] 歷史學者甘懷眞（2024，頁 9-10）認爲，all-under-heaven 的翻譯錯誤地將天下理解爲世界。他認爲天下的「天」不是物理或地理意義的天，而是宗教的天，天下是「天神所治理的限定領域的人間」，所以「治天下」原沒有征服世界的含義。政治學者石之瑜（2021，頁 10）則將天下翻譯爲 all bound to be related，認爲天下是所有行爲者必然彼此相關的一種「關係的狀態」。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夷的集合。[6] 雖然天下早在戰國時期便廣爲流行，但直到東漢時期才與國家緊密結合，出現「天下型國家」。天下型國家認爲統治的權力來自天的委任，身爲天子的統治者需要通過祭天不斷確認統治的正當性。由於該學說重視的是統治權力的來源，只有被天授權統治的地區才能被稱爲「天下」，因此對天下的定義是狹義的中國，只有在唐太宗時期才短暫地將四夷納入天下（渡辺信一郎，2003）。甘懷眞（2018，頁103）主張的「作爲政體的天下」則從宗教和冊封的角度提出相近的見解，認爲唐朝之後的四夷之國已經是天下之外的外國，不屬於天下。

國際關係研究爲解釋國家間行爲，多採廣義天下的觀點，將天下理解成存在於古代東亞地區的國際體系，包括中國與周邊諸國。趙汀陽（2016，頁 50-59）將周朝創建的天下體系看作一種世界政治體系，認爲該體系可以將外在的邦國變成內部的存在，並藉由「內部化」的方式維繫核心的地位與體系的穩定。所以「天下」的範圍，可以被理解爲東亞國際體系。無論將天下總結爲同心圓結構還是非同心圓的複合結構，天下既包括接受朝貢的諸核心大國，也包括朝貢的各國（李揚帆，2016）。對天下的批判，也大多將天下的實體範圍與西發里亞體系進行對比，認爲天下對應的是一個國際體系（徐建新，2007，頁 123）。

作爲古代東亞地區國際關係的重要內容，朝貢的歷史與天下概念作爲一種思想的，甚至是哲學的概念的關係爲何，歷史學者與國際關係學者的觀點並不一致。廣義上，天下是歷史上存在的東亞國際體系，實際上就是當時的朝貢體系；如果將「秩序」視爲是體系運作的規則與安排（Ikenberry & Nexon, 2019），則「天下秩序」的制度性內容即是朝貢體系的倫理觀界定的名分規則，核心是儒家的「禮」所界定的君臣關係。因此建構天下秩序的第一步便是建立中國皇帝與外國君主的君臣關係，而建立君臣關係的方式便是冊封，所以中國主管外交的單位即是「禮部」，被冊封者確認冊封名分的實踐即是「朝貢」。但現實中外國與中國的關係可能更接近貿易，不必然以「冊封」爲條件，而需參考史實中雙方的實踐（甘懷眞，2018，頁

6 渡辺信一郎（2003）認爲，隨著戰國征伐與秦漢的擴張，狹義天下即中國的範圍隨之拓展，從戰國時期的方三千里逐漸變爲兩漢時期的方萬里。

臺灣大學期刊資料庫

96-103）。例如西嶋定生（2002）認爲，以中國爲中心的冊封體制在宋時已經終結，之後東亞世界的交往主要是經濟聯繫而非政治冊封。趙汀陽（2018）回應對天下的質疑時則表示，僅有冊封之名而無支配之實的朝貢體系並非天下體系，提出了「天下衰於春秋而亡於秦」的結論（趙汀陽，2016，頁 135-136）。但對於渡辺信一郎來說，中國朝廷的「禮」實際上同時體現三種秩序：天子與中央官僚、天子與地方郡縣和諸侯，以及天子與四夷，最後一種秩序即是「天下秩序」（王德權，2006，頁 143-202；張登及、陳瑩羲，2012，頁 94）。

既有關於天下的國際關係研究大多仍基於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朝貢體系（tributary system），將天下概念視爲是古代東亞國家對正當國際秩序的出發點，而將朝貢看作天下的具體制度實踐（莫翔，2017；張登及、陳瑩羲，2012，頁 96），甚至認爲形式不平等的朝貢制度，是天下秩序的基本元素，以對比於歐洲西伐利亞條約後的主權平等體系與現代國際秩序。即便朝貢由政治關係退化爲經貿關係，作爲理念共識的天下秩序與禮制安排，仍在東亞國際交往間發生作用。替代朝貢的新型體系，19 世紀前在東亞也沒有落實（李揚帆，2015，頁 29-39；張登及，2010，頁 37-38；張登及，2020，頁 557-561）。關於古代東亞地區的國際關係研究，無論是越南或中國，也仍將朝貢行爲與天下秩序緊密結合在一起（Nguyen, 2023; Wang, 2012）。本文依循大多數國際關係研究，採取廣義的天下概念，將天下體系看作越南在近代前不同歷史時期所處的國際體系，而朝貢則是實踐該體系成員政治互動的重要方式。

與以自己爲中心的中國天下觀不同，越南的天下首先需要處理的就是與實力強大的中國的關係。通常來說，越南認爲自己是南方的核心，而中國則是北方的核心，雙方「各帝其國、各華其華」，平等統治各自的領土。李朝時創作的「南國山河南帝居」，就是這種觀點的典型寫照。這種天下觀念既不同於朝鮮的小中華思想，也與日本內外朝的中華觀念不同。越南認爲自己與中國同屬中華，且是中華世界的不同核心，越南與中國在此世界之地位是平等的，而實際交往中越南實踐「外王內帝」（張哲挺，2023，頁 173-174；Vuving, 2009, pp. 79-80）。滿清入主中原之後，儘管越南仍維持對中國朝貢，卻更希望從文化角度論證自身的優越性，力圖證明越南是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國文明水準相當的「文獻之邦」（Chang, 2024），當越南使臣李文馥被清朝官員安排入住夷館時，越南官員曾經由拒絕入住並撰文辯論的方式，證明越南是「華」而非「夷」。

由此，越南便擺脫邊陲的位置，成爲並列的「中華」，可以文明的先鋒和代理人（vanguard and agents of civilization）的身份，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關係（Vu, 2016）。與中國式「禮不往教」的天下觀不同，以神農後代自居的越南更認爲自身肩負教化蠻夷的責任，主動要求哀牢、占城等國向越南朝貢，並對其進行越南式的改造，即「用夏變夷」，「變蠻習爲漢風」，以此推動改土歸流，有助於古代越南的領土擴張（Chan, 2020; Liam, 2023），可見其天下觀較中國更爲外向。當周邊小國拒絕承認越南的優越性或疏於朝貢時，越南會對其施加嚴重的懲罰，其觀念對於現在的越南外交仍有影響（Nguyen, 2023）。

## 二、關係與權力途徑的中國天下

本文將受「天下」概念影響的國際關係研究，分爲贊同天下秩序的禮儀規範有其作用的「關係」途徑研究，與認爲天下秩序的基礎主要在於物質實力的「權力」途徑研究。贊同天下概念有用的研究大多認爲因爲天下秩序有禮儀的理念爲基礎，即便該體系無法確保所有行爲者都能獲得滿意的結局，但也可以保證體系一定程度的和平與安全（趙汀陽，2016，頁 12）。這些研究可以用「關係」的概念理解天下體系成員彼此如何相關。如趙汀陽（2018）認爲天下體系區別於個體理性的西伐利亞體系的地方，在於關係理性與共在存在，秦亞青則認爲朝貢體系與西伐里亞體系的差別在於體系中的「關係的性質」（Qin, 2016）。這些文獻將儒家倫理視爲影響國家對外決策的重要變因，認爲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國家，將儒家規範的倫理關係延伸到國與國之間的秩序，使國家脫離「無政府狀態」，有辦法透過和平而非暴力，處理國家間關係（高明士，2008；張登及，2020，頁 557-561；Zhang, 2013）。儒家禮治成爲維繫古代東亞國際秩序的重要支柱，重要性不亞於物質權力，具有文化道德主義（cultural realism）特徵（陳康令，2017；Zhang, 2002）。

關於古代東亞地區國際關係的實證研究，可以部分證實上述關係主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論述。東亞地區自 1368 年到 1841 年間的戰爭紀錄顯示，中國與儒家文化圈的國家確實能夠維持長期和平（Kang, 2010）。學者對李氏朝鮮的研究也發現，丙子胡亂時的朝鮮明知不敵實力強大的清朝，但仍出於父子君臣的倫理關係和明朝的救命之恩而出兵援明。對於明、清的研究同樣發現，即便具有實力上的優勢，但中國仍出於文化克制（cultural restraint）大體維持了與儒家文化圈國家的和平，沒有以其不平等的權力地位肆行擴張（張登及，2023，頁 253-261；楊仕樂，2017，頁 53-55；楊仕樂，2018，頁 109-112；Kelly, 2012）。

作爲飽受爭議的國際關係概念，「天下」理念與「關係」途徑自然同時受到歷史學與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研究的批判。朝貢關係是否完全實現君臣等級，仍是值得商榷的問題。莊國土（2005）質疑朝貢只是文人史官構建的虛幻假象，歷史學者葛兆光（2015）更直言理想的天下並非眞實的歷史，秩序的建立並非協和萬邦的過程而是殘酷戰爭的產物。「天下無外」的原則並沒有被眞正實踐（徐波，2017，頁 95），中原王朝也並非中國例外論（Chinese exceptionalism）所描述的那樣重視和諧與和平，反而在長期歷史互動中形成了文化現實主義傳統與大規模遠征的戰略文化（時殷弘，2011；Johnston, 1995）。在現實主義者看來，儒家倫理關係之所以能夠成爲東亞國家的互動規範，靠的是霸主的權力優勢而非各國對天下秩序裡名分關係的嚮往。如果中原王朝的實力持續衰落，即便仍佔據倫理關係的規範優勢，其在國際體系中的位置也勢必隨之調整（Wang, 2010, 2013）。

支持現實主義權力邏輯的實證研究指出，天下體系並不總能維持和平的秩序，中原王朝與周邊國家的戰爭頻率，有時隨著中國實力上升而增加，儒家規範無法保證體系和平（Meng, 2023）。例如當宋遼權力對比發生改變時，即便宋朝仍然是儒家正統，東亞國家的朝貢格局與國際體系也會隨之改變（張登及、金世勛，2017）。也有研究者堅稱，東亞曾存在著沒有儒家規範的國家間關系。如高麗與金的朝貢關係雖然以儒家禮儀進行，但兩國並不共享儒家價值。文化的親近也無法保證國家在體系中，總是獲得更友善的對待（朴炳培，2022；萬曉，2017，頁 97-99）。另一個弔詭的倫理關係研究還反向指出，儒家文化圈有雙方關係越親密，優勢國不滿小國時，懲罰越嚴重的情況（蘇軍瑋，20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三、關係與權力途徑的越南天下

現代越南語中寫作 Thiên Hạ 的天下，同樣是越南歷史典籍與當代社會的常用詞彙，至今仍對越南外交產生影響（Nguyen, 2023）。與中國的天下不同，越南既要以小事大對中國朝貢，又以天朝上國自居接受周邊國家的朝貢。本文認爲，關於越南的天下研究，同樣可分爲關係與權力兩類。重視文化規範與儒家倫理的關係主義文獻認爲，古代越南歷朝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其內外政策的儒家色彩十分濃厚（Nguyen & Ho, 2019）。在中國所建立的朝貢體系中，越南始終希望藉由文化競爭提升其在體系中的地位，與朝鮮等國競爭誰更接近或更能代表中華（張崑將，2015；羅樂然，2022），甚至希望與中國展開文化上的競爭（Chang, 2024）。對於越南的實證研究也發現，1365 年到 1841 年間越南的戰爭對象多是內部的叛亂團體，與中國的戰爭相對較少，戰爭結束之後也大多較快恢復和平，而非中國持續佔領下，雙方進行交戰（Kang et al., 2018）。

儘管康燦雄等認爲越南並沒有將中國視爲首要威脅，但吳本立（Brantly Womack）卻認爲由於越南與中國的權力不對稱，越南常常過度關注中國的行爲，甚至會放大中國對越南的敵意（黃瓊萩，2016；Womack, 2006）。從天下看越南的研究也認爲，雖然古代越南曾試圖在對外交往中推廣符合儒家規範的政策，但並沒有眞正實踐天下無外的原則，越南對周邊「蠻夷」的擴張傾向也十分強烈（Liam, 2023），渴望成爲中南半島的核心（左榮全，2014）。對於強大的中原王朝，越南雖長期維持對中國的朝貢，但當兩國權力對比發生改變時，越南對中國的朝貢關係的內涵也會發生改變（Anderson, 2013; Nguyen, 2021），始終希望脫離中國而建立越南的朝貢體系（Nguyen, 2019）。

回顧越南與周邊國家的交往歷史，占城、哀牢等國都曾長期與越南交戰，宋元明清等中原王朝也都與越南爆發過衝突，甚至有攻入越南都城的記錄，符合權力政治的解釋。但另外一方面，符合關係主義解釋的案例也十分常見，越南可經由和平手段解決與周邊國家的矛盾衝突，甚至出現大國向小國割讓土地的情況（段紅雲，2021）。正如前文對中國天下研究的介紹，如果僅從權力或關係切入，體系內都有大量無法被解決的特例，因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必須結合權力與關係的途徑。既有的關係主義文獻雖然不否認權力的作用，如關係平衡（balance of relationships）理論認爲國家在對外交往時可根據自身判斷選擇使用關係或權力平衡（Shih, 2017），但這些文獻尚未提供明確的判斷標準或先後順序。從權力不對等角度看待越南對外交往的研究，則大多將越南視作天下體系的小國，不僅低估了歷史經驗對越南的影響，還忽視了越南認爲其與中國平等的主觀看法（周功輝、黃瓊秋，2018，頁 312；Yu, 2009）。更爲重要的是，越南的實力雖然遜色於中原王朝，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仍強於占城、眞臘等周邊國家，僅從小國的角度，認爲越南在天下體系裡十分被動，與歷史現實不符。

# 參、研究設計

## 一、理論建構與研究假說

關係途徑的國際關係研究大致可分爲基於建構主義的關係主義研究，和基於社會心理學式的關係主義研究。前者的代表是秦亞青的過程建構主義（Qin, 2018），而後者則是石之瑜的關係平衡理論。過程建構主義認爲國際關係的世界是相互關聯的世界，關係構建了行爲體的身份。與開啓關係轉向（relational turn）的研究類似（Emirbayer, 1997; Jackson & Nexon, 1999），過程建構主義強調過程在本體論上的重要意義，認爲過程可以定義行爲體的角色與身份，角色與身份則決定關係並制約或促成國家的行爲（Qin, 2018）。但是該理論對關係的定義不夠清楚，使其在實際研究中，面臨無法辨別與操作的難題（陳納慧，2022，頁 43-44；Pan, 2020, pp. 17-18）。

關係平衡理論的「關係」定義相對清晰，認爲關係是國家間的「想像共性」（imagined resemblance），[7] 而天下則是所有行爲者必然存在關係的

[7]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儘管石之瑜將 resemblance 翻譯爲「共性」，但共性非僅相似性，而是雙方可以共同接受的建構集體認同的基礎。互動雙方可以在此基礎上安排角色，並經由對角色的實踐，緩和利益衝突帶來的問題。如果一方無法接受另一方與自己是類似的，那麼客觀上相似性高，共性反而低。舉例來說，日本使臣小野妹子帶給隋朝的國書中「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的措辭，讓隋煬帝非常不滿，並要管理外交的鴻臚寺「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對於隋煬帝而言，天子是中國皇帝的專

臺灣人學與知識期刊資料庫

狀態（石之瑜等人，2019）。國家可以基於文化、語言、制度、信仰、任務、價值觀等建立和確認共性，並在此基礎上構建身份與認同，進而定義和處理互動問題。共性可分爲國家在交往前已經存在的「前置共性」（prior resemblance），以及國家在交往過程中根據既有脈絡創造並確認的「即興共性」（improvised resemblance）。國關理論所稱的「關係轉向」（relational turn）所討論的關係，在本文即是前置共性，所以共性甚至可以理解爲對互動雙方身份的共識。當前置共性非常薄弱，雙方無法識別並想像與對方的身份時，只能針對各自的特點創造和確認即興共性，並在此共性的基礎上創造雙方共同接受的角色，之後藉由儀式性的角色實踐，緩和利益衝突並穩定雙邊交往。

換句話說，爲了建立穩定可預期的互動模式，國家必須維持與他國的「關係／共性」。同處一組關係中的兩國，雖然物質權力強弱有異，本體論上卻是平等的，因爲大小國都可以建構和改變共性，也都可能爲確保關係穩定而忽略部分「權力」定義的利益。但是當國家認爲關係已經徹底變質而無法確認共性時，就會回歸權力邏輯以懲罰對方，再試圖構建新的共性。若將「天下」定義爲關係的總和，它會呈現在控制較少的自發式天下（spontaneous tianxia）與宰制較強的治理式天下（governed tianxia）間來回擺盪（石之瑜，2021；Shih, 2024, pp. 20-23）。[8]

如前文所述，僅從關係途徑理解古代東亞並不完整。過程建構主義的關係理論雖然不排除作爲物質能力的權力，但由於定義不清等問題，關係性權力與軟實力乃至硬實力的界限並不清晰，將關係性權力等同於面子或威望（秦亞青，2018，頁 41-42）的做法更模糊了關係的本體論意義。關係平衡理論雖然對關係的定義較爲清晰，也不否認權力的作用（Shih, 2017, pp. 20-22），但其理論重點在於行爲者如何識別和確認共性，忽視了權力對國家對外政策的影響。

---

屬稱謂，而日本作爲冊封體系內的東夷列國，不該被稱爲天子。因此，日本與隋朝在天子方面的相似性越高，隋朝就越難確認與日本的共性。

8 作者認爲，前者可稱爲老子／道家的天下（體系），後者可稱爲韓非／法家的天下（體系）；而儒家的天下則居於其中。另外也可以將它們看做三種不同的「國際社會」（international society），進行理論的探討。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基於上述考量，我們首先在定義方面徹底區分「權力」與「關係」。關係方面，本文採取定義較爲清晰的關係平衡理論，認爲關係就是國家間想像的共性，可分爲前置共性和即興共性，而天下則是所有行爲者必然存在關係的狀態。權力方面，本文採取 David Baldwin (2013, pp. 274-275) 的定義，認爲權力是國家資源的總和，即國家所擁有的財產或能力。該定義區別於關係性權力（relational power），與大多數現實主義學者所採取的「權力要素」分析框架相符。本文的第一個研究假設基於關係平衡理論。該理論認爲國家間需要識別和喚起共性以確認關係，並由此產生集體的認同與身份，而集體認同與身份又可以影響國家的對外政策。但是國家無法憑空識別與建構共性，需要在一定的脈絡下進行，而前置共性正好爲國家提供了識別和建構的脈絡，由此得到假說 1。

**假說 1：前置共性多的兩國，優先選擇確認共性。**

確認共性後的兩國由於身處同一關係網絡，雙方都可以改變或影響關係，不必完全按照權力大小進行互動。爲了確保關係的穩定，兩國並不總是追求即時的物質性利益，有時可以犧牲當下的利益，來恢復和確認共性。由是，本文推出假說 2。

**假說 2：共性獲得確認時，如果兩國產生利益分歧，國家會優先以關係平衡方式協商處理，過程特徵爲和平。**

當兩國面臨共性危機或無法確認共性時，關係平衡理論認爲國家既有可能繼續在逐利上克制以創造關係，也有可能放棄舊關係、攻擊對方，以建立新關係。由於國家間的權力差距，小國很難經由軍事行動懲罰大國，因此本文假設越南會根據權力對比情況，而採取不同的措施，即得到假說 3。

**假說 3：當兩國面臨共性危機或無法確認共性時，越南更常對大國採取關係平衡，而對小國採取權力平衡。**

由於共性確認的結果通常是達成一套對雙方都暫時具有約束力的身份規則，國家藉由儀式性地實踐特定身份以緩和原本衝突的身份意識，進而實現穩定的互動。在古代東亞，這種具有階層屬性（hierarchial）的身份安排與儀式性的角色實踐，典型案例就是各國的朝貢行爲。雙方建立朝貢關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係時需要明確彼此的身份與地位，朝貢的過程也需符合規定的禮儀，而禮儀又代表和反映了特定的層級，因此本文將朝貢實踐作爲判斷共性的重要指標。如果兩國能夠就名分、冊封、層級、禮儀達成共識，則可認爲兩國之間的共性得到確認。如果任何一方不贊成上述事宜，則共性沒有被確認。由於共性並非一成不變而需要不斷確認，如果兩國出現中止貿易、部分履行義務、拒絕使者、地方衝突等問題，則兩國的共性出現危機。

儘管共性的內涵五花八門無法事先範定（石之瑜，2021，頁 129），但本文以朝貢實踐界定共性情況，與朝貢密切相關的語言、文化、規範、宗教信仰等便成爲前置共性的重要部分。當國家發生重大政局變化乃至改朝換代時，前現代東亞國家舊有的朝貢關係，將成爲兩國前置共性的重要內容。雙方會先在舊關係的基礎上，創造並確認新的共性，而確認後的共性又將成爲國家後續互動的前置共性的一部分，形成穩定的路徑依賴。而「關係平衡」，指的是兩國爲了確保關係穩定而採取的措施，如致書、遣使、贈禮、協商等，希望對方基於維持共性而選擇合作，保持關係可預期性。「權力平衡」則是以物質性實力影響對方，迫使對方廢棄或重建共性，回歸穩定互動。如現實主義理論所示，權力平衡通常涉及軍事行動，包括擴充自身軍事實力的內部制衡與結盟的外部制衡。

## 二、案例選擇與研究方法

本文藉由「具有歷史認知的國際關係研究」（history-informed IR）途徑，呼應歷史學從周邊看中國的研究取向，採用比較歷史分析法研究權力與關係對於古代越南外交的影響（吳玉山，2018，頁 18；葛兆光，2017）。比較歷史分析法藉助對歷史案例的深入研究，經由理論驗證、情境比較、宏觀分析等探究事件發生的過程、原因與因果機制，尤其適用複雜變數的小樣本研究（費海汀，2019）。具體案例與假說驗證部分，本文將採取比較研究、過程追蹤（汪衛華，2022；劉浩然，2018）等方法進行案例研究（Gerring, 2004; Seawright & Gerring, 2008）。

歷史與國關的批判研究認爲，國際關係學者由於欠缺歷史學素養，無法準確把握和考證歷史細節。本文作爲具有歷史認知的國際關係研究，難免遭遇類似問題。歷史紀錄與歷史事實的關係難由文本斷案，歷史學界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未有定論（王明珂，2018）。由於明清與越南的歷史紀錄比較豐富而其他國家留存的歷史資料相對較少，因此本文主要採用明清與越南史料。但爲確保準確，本文除採用《大越史記全書》、《明實錄》等多方史料外，還參考 Anthony Reid、山本達郎等權威歷史學者的研究著作，在歷史學研究基礎上進行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構與檢驗，而這也是對歷史與國關研究的歷史途徑反思所得的解決方案。

古代東亞與中國維持朝貢往來的國家，大多欠缺系統的歷史資料，僅有越南和朝鮮是少有的例外（楊仕樂，2017，頁 61）。與自認小中華的朝鮮不同，越南不僅認爲自己應當是與中國平等的各帝一方的南帝，還因爲地理位置的原因與周邊國家保持密切交往，建立起了一個既區別於朝鮮等傳統朝貢國又不同於中國的天下體系，至今仍對越南外交產生影響（Nguyen, 2023），爲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標的。理論選擇方面，本文並不排斥權力政治的現實主義或過程建構式的關係主義，並且認爲越南與各國的交往歷史顯示，文化理念構成的關係與物質性結構下的權力，其影響都不宜排除。作者因此嘗試提出這兩種角度的結合，希望同時經由對關係定義更爲清晰的關係平衡，和現實主義傳統倚重的權力平衡，提出較完整的解釋。

儘管學界對越南獨立的起點仍有爭議，但普遍認爲越南最遲在 968 年丁部領建國時已經獨立（于向東、成思佳，2020），而中國最晚在 1164 年封李英宗爲「安南國王」時已經認可越南的獨立地位（陳鴻瑜，2019，頁 54）。李朝之後，越南北部歷經陳、胡兩朝，在 1407 年被明朝短暫兼併，重新設置中國的郡縣。安南屬明期間，明朝改安南爲交趾並設置三司等行政機關。1427 年黎太祖黎利建立後黎朝並獲得明的冊封，越南重新成爲獨立的國家。後黎朝傳承近四百年，成爲越南歷史上時間最久的朝代，並分別與明、清建立關係。後黎朝包括國力鼎盛的黎初朝（Nhà Lê sơ）和國力衰微的黎中興朝（Nhà Lê Trung Hưng），而在黎中興朝時期，越南又出現南方阮主與北方鄭主的對立情況，[9] 雙方均嘗試與周邊國家建立外交關係。

[9] 黎中興朝時期，居住在北方的後黎君主只是名義上的統治者，實際權力掌握在北方的鄭主與南部的阮主手中。鄭主是擁立黎莊宗復興後黎朝的阮淦的女婿鄭檢的後代，阮主則是阮淦之子阮潢的後代。起初，阮主只是後黎派往順化的鎮守，後來隨著矛盾加深，阮主拒絕再向鄭主控制的後黎朝繳納賦稅並與其展開多次交戰，最終與鄭主形成

臺灣人學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由此我們便可在盡量控制其他變數的情況下，研究後黎朝爲何面對不同朝代的中國，產生不同的反應；以及不同時期的後黎朝，爲何對相同的周邊小國採取不同政策。另外，由於明朝曾在越南大力推廣儒學教育，後黎朝在明朝的基礎上，也建立更完備的儒學教育與科舉制度，產生龐大的士大夫階層，因此留下了豐富的歷史資料，爲本文提供了充足的素材。

關於假說 1，本文以後黎與明清的案例，考察前置共性更多的兩國是否優先確認共性。關於假說 2，本文以越南與周邊大小國的利益糾紛爲例，分析越南如何處理與周邊國家的利益糾紛，重點考察軍事衝突與共性的關係，以及是否存在共性獲得確認時，反而優先採取權力平衡。關於假說 3，本文將對比後黎朝與大小國的交往情況，觀察越南是否對小國更常採取權力平衡，而對大國較常採取關係平衡，以及當後黎朝的權力衰落時，是否更少採行權力平衡。

# 肆、天下的越南：後黎與明、清

## 一、後黎與明

### (一) 共性與關係

自丁部領統一越南建立丁朝以來，越南歷朝都十分重視發展與中國關係。開寶 6 年（973），宋應丁部領與其子丁璉的請求冊封丁朝君主爲「交趾郡王」。黎桓與李公蘊建立前黎朝與李朝後，均效仿丁的方式遣使如宋，請求獲得宋的認可。雖然對越南君主取得權力的方式感到不滿，但宋眞宗等認爲「黎氏代丁，李氏效之，黎李何擇焉」，仍舊按照慣例確認與越南的關係，「受其聘」，「用桓故事」。李英宗獲封「安南國王」後，接替李朝的陳朝君主則進一步以「安南國王」爲基礎，鞏固與中國的關係。

1368 年，越南陳朝收到朱元璋登基的消息後，立刻派遣禮部侍郎等「奉表來朝」，希望建立與明的關係。明太祖朱元璋則在得知陳朝請封後「仰天撫手」，並於冊封陳裕宗爲安南國王的詔書中盛讚越南「奉表稱臣專

以瀘江爲界的對峙局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使來賀」的行爲，認爲其「眷茲勤誠深可嘉尚」，很快就完成了與陳朝的共性確認。陳裕宗去世後，明太祖不僅「素服御西華門」迎接使臣，還親自撰文悼念「誠意歡洽如我舊臣」的陳裕宗，感慨「藩邦賢王何去之速也」，並冊封繼承者爲新任的安南國王。[10] 囿於史料限制，作者自無法詳細測量中、越雙方對此共性的認可程度，但圍繞此事的官方宣示與雙方君主的應處，足證彼此對名分的安排有最低限度的認同，而該認同也並未在短期內被推翻。在此之後，陳朝與明朝的交往均圍繞安南國王與明朝皇帝的角色定位展開，而此種角色安排也爲後黎構思與明的共性提供了重要脈絡。

明建文年間，陳朝權臣黎季犛[11] 篡權後仍假託陳氏名義與明交往，直到永樂年間才被發現。事情敗露後，黎季犛假意迎接陳朝宗室子弟陳添平（Trần Thiêm Bình）回國執政，但卻在明朝軍隊護送陳添平返國時率兵劫殺，引發明廷強烈不滿并導致明入越戰爭。戰後，越南雖被劃入明朝版圖但民變不斷。永樂 16 年（1418 年），黎太祖黎利在藍山起兵，並於宣德元年（1426 年）初步控制局勢後，謀求與明朝恢復關係。宣德元年 4 月，明宣宗朱瞻基與朝臣等討論越南情勢時表示，明朝出兵的初衷是懲罰黎季犛並恢復陳的統治，後來因爲遍尋陳氏子孫不得才將其納入版圖。如果有陳氏後代，願意讓越南「自爲一國」，只需「歲奉常貢」即可。內閣首輔楊士奇也表示「交阯於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堯舜禹湯文武」都沒有治理過越南，作爲天下父母的皇帝不必計較此地得失。[12] 當年 11 月，與王通等明朝官員保持往來的黎利得知中國希望搜尋陳氏子孫的用意（鄭永常，1994，頁 214），宣稱發現了陳氏後裔陳暠（Trần Cảo），以陳暠的名義與明朝互動。

次年 8 月，後黎朝先以黎利的名義向明朝進表，表文以「高皇帝龍飛，安南首朝貢」的措辭喚起明的共性，表示此前只是因爲戰亂才沒有發現陳朝後裔，但經過持續尋找現已訪得陳暠並請求明朝冊封。之後，黎利又讓

10 詳情可參閱《明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五一》。

11 黎季犛是越南陳朝外戚，祖先本姓胡，被黎氏收養後改姓爲黎。陳朝末年，黎季犛逐漸掌控朝權，逼迫女婿陳順宗將皇位禪讓給年僅三歲的陳少帝後又廢帝自立，於西元 1400 年建立胡朝，並改回其原來的姓名胡季犛（Hồ Quý Ly）。

12 詳情可參閱《明實錄・附錄・明宣宗寶訓・卷二・繼絕》。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陳暠以「先王暪三世嫡孫」的名義向明朝進表，「事大之誠」。[13] 除了表文，後黎還主動歸還俘虜的明朝士兵與繳獲的虎符等戰利品，願以禮儀確認與中國過去朝貢的身份，穩定關係的可預期性。

10 月，朱瞻基對群臣表示明太祖初定天下時，越南的陳朝最先來朝，歷代皇帝提起陳朝無後都很唏噓感慨，如今既然發現了陳朝後裔，可息兵並恢復關係。此時明朝在越南的戰事發展雖然並不如預期順利，但仍佔領越南北部領土且軍事實力較強。據山本達郎（1950/2020，頁 587-590）考證，即便在後黎攻勢最猛烈時，至靈城等地仍在明軍控制之中。11 月，滿意後黎懇切態度的朱瞻基派遣禮部左侍郎李琦等出使越南，認可陳朝「首先歸誠恭效臣節」的共性，願意遵循「洪武舊制」恢復與越南的朝貢關係。[14] 宣德 3 年（1428），後黎以陳暠離世爲由，請求冊封黎利並進貢大批金銀器與方物。明方雖要求後黎繼續尋找其他陳氏後裔，最終在 3 年後同意冊封黎利爲「權署安南國事」。朱瞻基去世後，明英宗朱祁鎮於正統元年（1427）以「陳氏宗支既絕」爲由，正式冊封黎利之子黎麟爲「安南國王」，中越就名分關係達成共識，完成共性確認。

### (二) 共性與衝突

宣德 6 年，明宣宗派遣禮部右侍郎章敞到後黎，正式冊封黎利爲「權署安南國事」，確定兩國的貢例爲三年一貢。正統 2 年，冊封黎麟爲「安南國王」的明兵部右侍郎李郁抵達越南，後黎君主安排了重大的典禮儀式，並就此事奏告太廟。越方此後按時「如明歲貢」，逢雙方發生重大變故時都互相遣使通報。據統計，截至嘉靖元年，後黎共向明遣使 62 次，目的包括「歲貢」、「告哀」、「求封」、「謝恩」、「奏事」、「賀喜」等；明共遣使 22 次，目的包括「致祭」、「敕封」、「告即位」、「賜綵幣」、「言地方事」等，雙方共性持續穩固。[15]

根據越、中兩國的歷史資料，自宣德 6 年到嘉靖元年，後黎與明至少有

---

13 詳情可參閱《大越史記全書・卷之十・黎皇朝紀・太祖高皇帝》、《明史・列傳第二百九・外國二・安南》。

14 詳情可參閱《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第三十二、三十三卷。

15 作者根據《大越史記全書》、《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明史》、《明會要》統計。

臺灣人學專期刊資料庫

過 7 次關於土地的利益糾紛，分別是：正統 3 年的太平府與太原鎮的土地糾紛；正統 7 年、9 年、11 年、12 年的欽州、龍州與思郎州的邊界糾紛；[16] 景泰 7 年的安平州與思郎州的侵掠糾紛；成化 3 年（1465）的安平州土官的越界侵擾。如表 1 所示，這 7 次事件都沒有導致兩國官方的軍事衝突，而以「奏事」、「會勘」等方式解決，奏事者通常是負責朝貢事宜的使臣。除了領土糾紛，後黎與明還曾就華僑和海盜問題產生糾紛，但也都藉由和平方式解決，而未訴諸武力衝突（藤原利一郎，1975，頁 281-296）。

**表 1**
後黎朝與明朝的領土糾紛

| 時　間 | 分　歧　方 | 分歧原因 | 解　　決　　方　　式 |
|---|---|---|---|
| 1438 | 明安平州<br>後黎思郎州 | 相 侵 略 | 明遣使要求後黎還侵地<br>後黎謝罪並申訴，令守臣嚴飭 |
| 1442 | 明龍州土官<br>後黎思郎州戎村 | 越界侵略<br>擄 人 畜 | 後黎遣侍御史趙泰如明奏事 |
| 1444 | 明龍州土司<br>後黎太原鎮 | 越界侵略 | 後黎遣東道參知阮蘭奏如明奏事 |
| 1446 | 明龍州土司<br>後黎太原鎮土民 | 越界侵略 | 後黎遣海西道參知阮叔惠如明奏事 |
| 1447 | 明龍州、欽州<br>後黎太原鎮 | 越界侵略 | 後黎遣御史中丞何甫奏欽州事，殿中侍御史程馭奏龍州事 |
| 1456 | 明安平州<br>後黎思郎州 | 相 侵 略 | 事經奏辯，明與後後黎到邊境會勘 |
| 1467 | 明安平州土官<br>後黎下琅州 | 越界侵略 | 後黎致書於明，固守關隘 |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大越史記全書》、《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明史》、《殊域周咨錄》整理。

16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十七》稱「欽州」並沒有衝突的紀錄，應是將「龍州」誤寫爲「欽州」。但《大越史記全書・卷十一》在明正統 12 年的部分明確記載，當年派遣如明的正使爲御史中丞何甫，職責爲「奏欽州地方事」；副使爲殿中侍御史程馭，職責爲「奏龍州地方事」。本文雖不考證衝突細節，但相關紀錄足以證明其中至少有一個地方曾發生衝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嘉靖 6 年（1527），後黎權臣莫登庸逼迫黎恭皇禪位後建立莫朝，6 年後阮淦等擁立後黎宗室在南部復國，後黎進入南北對峙的黎中興朝。雖然越南歷史典籍大多否認莫朝的正統地位，如《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提及莫朝官員時常冠以「僞」字，《大越史記全書》則用「僭位」稱呼莫朝統治者，將莫朝歷史附於後黎的條目之中。但莫朝確實曾以安南的名義與明、清交往，並險些造成戰爭。

嘉靖皇帝朱厚熜登基後，明朝派遣翰林院編修孫承恩等到後黎「告即位」，但由於後黎政局動盪而無法入境。嘉靖 15 年（1536），禮官夏言以「安南不貢已 20 年且國內叛逆」爲由，請求征討。[17] 但戶部侍郎唐胄上書，稱安南雖然政局動盪但堅持朝貢，只是因爲朝貢的姓名不符，才遭到明朝守臣的拒絕，是「欲貢不得，非負固不貢」。期間後黎派遣鄭惟僚等到明朝指控莫登庸篡權奪位。朱厚熜一方面懷疑後黎君臣的話語，另一方面又有朝臣以「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爲由，勸諫稱只要莫朝願意「稱臣修貢」就「不必遠征」，最終決定派遣軍隊到越南邊境考察情況，如莫朝統治者「束手歸命無異心」，「則待以不死」。

嘉靖帝的決定，爲莫朝創造越、中兩國均可接受的共性提供了重要路徑。嘉靖 19 年，已多次上表請降的莫朝君主率領宗室與群臣 42 人到邊境鎮南關「囚首徒跣匍匐叩頭」，表達願「永爲藩臣」的決心。莫朝的行動獲得了明的認可，朱厚熜任命莫朝君主爲「安南都統使」，恢復了「三歲一貢」的貢例，兩國的共性得到確認。雖然僅有越南北部一隅的莫朝，在國內面臨內訌與阮主、鄭主挑戰的軍事危機，這是它爭取與中國強化君臣關係、尋求奧援的功利性動機，但莫朝的做法又成爲後黎與明交往的前置共性。萬曆 25 年（1597），後黎恢復與明的關係時，兩國的禮儀按照莫朝的方式進行，後黎君主的封號也繼續維持莫朝慣例的「安南都統使」，一直到明朝滅亡。[18]

---

17 出自《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二十九・土貢考》。

18 可參閱《明史・安南傳》、《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二十七至三十二、《大越史記全書》卷十五至十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二、後黎與清

### (一) 共性與關係

1636 年，皇太極在瀋陽稱帝，定國號爲大清。1644 年，李自成部攻入北京，崇禎帝朱由檢自縊景山。數月後，順治帝進入北京，宣告「定鼎燕京以綏中國」。[19] 入主中國的大清，不僅需要征戰南明，還要處理與越南等國的關係。

此時的後黎與清的前置共性十分稀少。雙方的語言、文字與習俗並不相同，推崇儒家規範的後黎菁英認爲滿人是蠻夷，對於「薙髮易服」的政策更是不滿，批評清「宋明衣冠禮俗爲之蕩然」，嚴禁越南民眾效仿。[20] 就算流亡清廷的後黎官員也不認可清的習俗，甚至提出「我輩頭可斷，髮不可薙；皮可削，服不可易也」。[21] 越南君主更公開嘲弄清朝君主的文化素養，如明命帝阮福皎嘲笑乾隆的詩歌「徒爲笑柄」。[22] 由於越、中前置共性轉爲稀少，雖然清朝渴望與後黎建立穩定關係，但兩國仍無法完成共性的創造與確認。

清軍入主中原後，後黎仍在 1646 年派遣阮仁政等高官到福建向南明的隆武政權朝貢，請求冊封黎眞宗爲安南國王。後黎使臣抵達福建時，正逢清軍攻城，與其他遭到清軍扣留的外國使臣一同被送至北京。此時的清廷並沒有使用武力手段解決關係問題，而希望與後黎等國就朝貢關係等雙邊共性議題有所確認，於是釋放了被扣押的外國使臣，賞給衣帽緞布，希望他們將清朝的敕諭帶回。在敕諭中，清廷表示理解後黎對南明的朝貢只是「臣事中國」的慣例。但既然清朝已經「撫定中原」且「視天下爲一家」，希望越方可以繳回「明所給封誥印敕」，由清「照舊封錫」。[23]

向隆武政權朝貢未果的後黎並沒有轉向清，而是在得知南明永曆帝朱由榔在廣東登基後，遣使向永曆政權朝貢。1647 年，朱由榔冊封黎神宗爲

---

19 出自《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九》。
20 出自《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三十四》。
21 出自《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四十七》。
22 出自《大南寔錄正編第二紀・卷二百十九》明命 21 年冬 10 月。
23 詳情可參閱《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之三十二》順治 4 年 6 月的部分。

臺灣大學期刊資料庫

「安南國王」，後黎爲朱由榔的使臣準備了隆重的儀式，安排禮部尚書、戶部左侍郎、僉都御史等高官迎接南明使臣。南明在冊封文書中盛讚後黎「獨承聲教」，「禮樂衣冠」堪爲模範，並有「朕惟漢家銅柱之封永綏南服，夏后塗山之會再見中原」的感慨。足見越南明知大明政權日薄西山，仍以禮事之，君臣之誼幾不下餘明朝和李氏朝鮮，共性堪稱異常牢固。此後，後黎與流亡中的中國永曆政府保持朝貢，互有遣使，直到確知朱由榔遇害。

雖然清朝當局希望與越南等國儘速建立關係，順治帝多次表示如果越南「稱臣入貢」，清廷不僅「一矢不加」，還「與朝鮮一體看待」，往來貢使甚至可以「直達京師，以示懷柔」，希望藉由退讓的方式繼承明朝與越南的共性。[24] 後黎起初並不接受，直到 1659 年才向清朝奉表，但仍拒絕繳回永曆政權所賜錫封敕命，「稱無繳送之例」。1662 年，黎神宗去世，越南順勢派遣使臣黎儼等到清朝告哀，清則派遣吳光等到越南弔唁，越、中雙方藉由朝貢與告哀，逐漸確認滿清入主「中國天下」的禮儀秩序。1666 年，後黎按照清的要求繳回永曆皇帝所賜印信，接受清朝的角色安排。康熙帝對此十分滿意，「上嘉之，命封黎維禧爲安南國王」，並在越方提議下將貢期定爲明萬曆年間的六年兩貢並進。在此過程中，物質實力遠勝越南的清朝並沒有採取針對越南的軍事脅迫而多次遣官移文，要求後黎繳送敕印，甚至還要求禮部討論可否遵從後黎聲稱的「前朝舊制」而「另頒敕印」。[25] 敕印繳回與冊封完成後，中、越終於就共性與實踐達成一致。[26] 此後雙方便長期圍繞安南國王與清國皇帝的角色安排展開交往，藉由禮儀實踐與角色

---

24 詳情可參閱《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三十三》順治 4 年七月的部分。

25 關於朝貢前後的交往詳情可參與《清史稿・列傳三百十四・屬國傳二・越南》、《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三十三》，以及《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卷十八、卷十九。

26 受限於歷史材料，本文雖無法準確還原後黎君臣對清的認可是否眞誠普遍，但可藉助後黎史書使用的年號合理推斷其對清的態度。在繳回南明印信之前，後黎在官修史書《大越史記全書》中仍堅持書寫南明年號，但在冊封完成之後則使用滿清年號。作爲內部史書，該書在書寫時並未過多考慮外國觀感，也沒有安撫或取悅外國的考量，多有僭越之處，如用皇帝稱呼後黎君主，私設年號且爲歷代君主僭上皇帝尊號。而作爲官修史書，書中內容經過後黎朝庭的多重審核。在此情況下，年號的變更或可證明後黎對清的認可已更爲確實。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扮演緩和身份與利益的衝突。[27]

### (二) 共性與衝突

康熙 6 年（1667），清朝派遣翰林學士程方朝等到後黎正式冊封黎玄宗爲「安南國王」，並就貢例等達成共識。後黎每 6 年按時「如清歲貢」，每逢清或後黎發生重大事情時雙方也都互相遣使。據作者統計，截止到乾隆 54 年，後黎向清遣使 33 次，目的包括「歲貢」、「告哀」、「請封」、「謝恩」、「奏事」等；清向後黎遣使 9 次，目的包括「致祭」、「敕封」等。[28]

日本歷史學者鈴木中正（1975）計算計，自康熙 6 年到乾隆 54 年，後黎與清的利益糾紛主要有四類：領土糾紛、邊境百姓與土官的越境糾紛、兩國間的貿易與勞務糾紛、叛亂與犯罪團體的引渡糾紛。賴淙誠（2004，頁 354-397）對後黎與清越界糾紛的研究發現，兩國始終沒有因爲以上利益糾紛發生戰爭。如表 2 所示，即便是被現實主義普遍視爲核心利益的領土糾紛，兩國也都經由文書往來與會勘的方式解決。

雍正 2 年（1724）中越糾紛以馬伯汎河勘界案爲典型。此時清廷知後黎藉明末以迄三藩戰爭，逐漸北侵，但黎裕宗卻反覆與清廷奏辯，指責中方邊臣沒有遵守自己的本分。面對越南的指責，實力明顯更強的雍正朝沒有採取軍事手段，而是從關係的角度處理越南的請求。在寫給黎裕宗的文書中，雍正皇帝表示清朝並不在意「區區四十里之地」，若後黎「以至情懇求」便可開恩賞賜，但後黎幾次「激切奏請」，「失事上之禮」。期間中、越雙方又發生禮儀上「三跪九叩」或「五拜三叩」之爭。不過由於後黎被申

---

27 華夷之辨與清的統治合法性息息相關。自皇太極以來，清朝統治者大多秉持華夷一體的論述，但其重點在於內部的滿洲、蒙古與漢地，如滿漢一體或滿蒙一體（段超、高元武，2020）。繳還印信並完成冊封儀式的安南雖然沒有被納入滿清的一體論述，但在清朝所構建的涵蓋各國的同心圓式朝貢體系之中，歷來與朝鮮處於較親近乃至最親近的位置，學界對此也多有共識。清朝歷代君主皆認可安南在朝貢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常常賜予安南不同尋常的殊榮。如康熙帝曾特別要求禮部不得「以故明卑視外國之禮」對待後黎，雍正皇帝則特賜御書「日南世祚」，乾隆帝更是以「眞如家人父子」形容其與安南國王的關係，並按照「阿哥服色」賞賜安南國王金黃蟒袍，其待遇「雖親貴大臣亦所難得」。

28 作者根據《大越史記全書》、《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清史稿》、《清實錄》統計。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飭後「詞意虔恭」，又同意使節「三跪九叩」，雍正決定將越方北進侵佔的清朝土地「賜予」後黎。[29] 兩國邊境糾紛如此得到解決，且是以小國指責大國而大國讓步的方式實現。雖然事發時清廷有青海戰事，但從清廷戰勝的聲勢看，實力仍顯然優於越南。對越妥協，與權力平衡的預期差距較遠，較符合關係平衡的解釋（段紅雲，2021）。

清與後黎時期的越南唯一的戰爭是乾隆 53 年（1788）爆發的清軍入越戰爭，但戰爭的雙方並非清與後黎，而是清與越南的反叛勢力西山朝。中方出兵的目的也並不在兼併越南、恢復漢、唐郡縣，而是支持與後黎關係而「出師問罪」，「興滅繼絕」，並在出征前就主動表示收復首都昇龍後，應立刻冊封後黎君主黎維祁爲安南國王。[30]

**表 2**
後黎朝與清朝的領土糾紛

| 時間 | 分歧方 | 分歧原因 | 解決方式 |
|---|---|---|---|
| 1689 | 清思陵州<br>後黎諒山、祿平州 | 那窩村歸屬 | 後黎遣刑部右侍郎段俊科等與清官員會勘 |
| 1697 | 清雲南開化府<br>後黎宣光屬州 | 牛羊、蝴蝶、普園三崗歸屬 | 後黎上疏，康熙帝詢問地方後認為非安南故地，移文責之 |
| 1725-1728 | 清雲南總督<br>後黎安南國王 | 馬伯汛之小賭咒河一百二里土地歸屬 | 後黎派兵部左侍郎等與清雲南總督、禮部侍郎多次會勘，數次上疏雍正皇帝後獲清廷賜地 |
| 1743 | 滇、粵界接安南關隘 | 土官越界侵略 | 雙方重修關隘，規定逢五、十開放，其他時間封閉攔截 |
| 1771 | 清思陵州土官<br>後黎祿平州 | 土民越界侵佔 | 後黎遣使商討，清歸還土地後，後黎獻馬感謝 |
| 1777 | 清雲南土觀<br>後黎安西六州 | 土地侵佔 | 後黎修書投遞雲貴辦正 |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大越史記全書》、《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清史稿・安南傳》、《清實錄》整理。

[29] 事件發生的背景是明末與三藩之變時，越方逐漸北進。至爭執發生，雙方曾各遣軍近 4,000 人對峙。而雍正 2 年，清朝最重要的對外事項爲派遣年羹堯、岳鍾祺進攻青海固始汗羅布藏丹增。雖然清軍勝，但財政負擔沉重，推測越方對此亦有掌握。雙方糾紛延續至雍正 6 年（1728 年）時，青海事已於 2 年前平定。詳情可參與《清史稿・卷二百九十一・列傳七十八・杭奕祿》。

[30] 詳情可參與《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千三百十五》乾隆 53 年 10 月下部分。

臺灣人學與術期刊資料庫

## 三、小結

後黎與明、清兩個前置共性不同的行爲者互動時，雖然都採用類似的方式創造和確認共性，但所使用的時間卻不相同。後黎自 1426 年開始與明朝交往，到 1427 年時便已基本完成與明的共性確認，並於 1431 年完成冊封，最終於 1436 年達成安南國王的身份安排，僅用 10 年便完成由停戰到冊封。而後黎在 1646 年就已經收到清的詔書，但直到 1659 年才首次向清朝進表，到 1666 年才按要求繳回南明敕印並完成冊封，用了 20 年。由此可見，後黎確實優先選擇與前置共性更多的國家確認共性，用時更少過程更順利，假說 1 可得到驗證。[31] 共性獲得確認後，後黎與明清兩朝均定期以朝貢等方式完成共性確認，其間發生的利益糾紛也都藉由和平方式解決。即便明、清的實力更強大，但是在關係中也會受到後黎的制約，並以大國向小國退步讓利的方式確保關係的穩定。本文的第二個假說得到初步檢驗。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國家確認的共性通常是一套對雙方都暫時具有約束力的共享身份，並藉由禮儀實踐緩和雙方的身份意識衝突。也就是說，國家並不需要完全承認禮儀角色對應的身份，只需要以實踐確認身份即可。[32] 宣德年間，明朝在處理與後黎的關係時對陳暠的身份與陳氏後裔的存亡雖有懷疑，但仍可藉由對角色的實踐確保關係的穩定，不必追求完全解決兩國實際上的矛盾。在朝貢問題上，後黎雖然在國內以皇帝自居且要求周邊小國向越南朝貢，但在與明、清交往時卻遵守「事大」之禮，實踐藩屬國國王身份。明、清並非不了解後黎的實際行爲，中方資料也都有關於後黎僭越的明確記錄，向後黎朝貢的占城等國也常向中國報告後黎僭越。但只要後黎與明、清王朝交往時，實踐了雙方禮儀身份約定的角色，中、越便不必因爲彼此「眞實」身份有矛盾，而以衝突解決實質爭端。

---

31 雖然同爲後黎朝，但與明交往的黎初朝和與清交往的黎中興朝的實力並不相同，前者的領土範圍與軍隊規模更大，清初的軍事力量也應比宣德年間的明朝更強。從權力平衡的角度推斷，應當是實力差距更懸殊的兩國更容易就身份共性之安排達成共識，結果是實力更接近的明與後黎更快完成確認。

32 相關分析參閱石之瑜（2021，頁 141）。

臺灣人學術期刊資料庫

# 伍、越南的天下：後黎與周邊小國

後黎的越南既是中國天下慎重的朝貢者，又要求占城、哀牢等小國向自己朝貢，事實上扮演著中南半島的「越南天下」的中心。本節將討論後黎與周邊小國的交往情況，探究共性與權力對國家間關係的影響，並比對越南與大小國的交往差異。

## 一、後黎與周邊小國的共性

中南半島國家大多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如占城起初的名字「占不勞」便來自梵語 champapura，種姓制度、曼陀羅體系等印度文化的典型特徵，在這些國家都有展現（陳英德，2015）。與印度化的濕婆信仰不同，越南的立國精神與文化規範一直受儒家影響，更接近宋明等漢文化王朝。越南自十一世紀以來設立的科舉考試以儒家經典爲選拔標準，培養了大批信奉儒家規範的士大夫。他們以唐宋中國的治國之道爲榜樣，用儒家經典論證越南在文化的優越地位，並在民間推廣儒學教育，以儒家規範教化民眾（Reid, 2015, pp. 47-49）。在行政體制上，由於受到中國文化與明朝制度影響，越南建立與明朝類似的行政體制，而非印度化的統治體系（郭振鐸、張笑梅，2002，頁 404-4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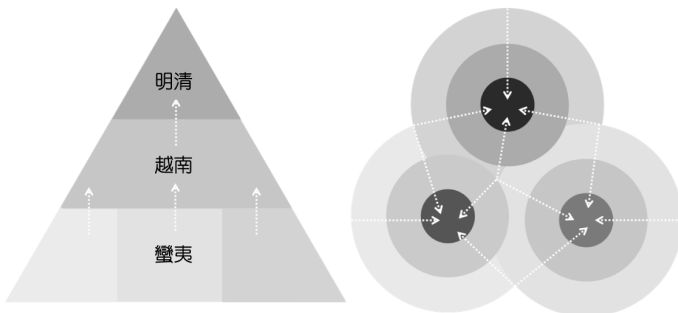
越南從儒家禮制的角度實踐朝貢，在與中國的互動過程中，取法中國的規範與經驗，因此後黎也以「天子」或「皇帝」的名義與周邊各國交往，要求各國「以事大之禮」對待越南。黎聖宗更頒布《諸藩使臣朝貢京國令》，詳細規定各國到後黎朝貢的規範流程，還仿照明朝的做法，設置接待使臣的「會同館」，安排「錦衣衛」與「五城兵馬司」維持朝貢使團的秩序。[33] 但《諸藩使臣朝貢京國令》提及的占城、老撾、[34] 暹羅、爪哇、滿剌加等國卻深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在對外交往時遵循的是「曼荼羅」或「尼加拉」式規範。

[33] 詳情可參閱《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十三》。
[34] 越南典籍也使用「哀牢」稱呼該地區。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曼荼羅源自梵文的 mandala，[35] 本義爲「圓圈」或「祭壇」，後來指代佛教與印度教的以須彌山爲中心的圈層式世界觀。尼加拉則源自梵文的 nagara，[36] 本義爲神聖之城，後來被用於指代首都、城鎮或村莊等基本的政治單元。儘管對曼荼羅式世界的研究仍有爭論，但基本認爲曼荼羅式的國家沒有中央集權制的行政體系，也沒有明確的領土邊界與範圍。國王的權力僅侷限於最核心的圈層，即國王所在的城鎮與周邊。地方首長雖然對國王效忠，但擁有幾乎不受控制的權力。國王被視爲濕婆或佛陀的化身，治理國家的正當性則源於佛教或印度教的神性而非儒家經典強調的德性，權力傳承不完全依賴血脈世系。曼荼羅世界雖有類似朝貢的行爲，但與儒家世界的朝貢差異極大：朝貢不是單一或排他的，國家可以同時向多個國家朝貢；朝貢不是厚往薄來的，小國需要向大國提供諸如金銀花樹等昂貴的禮物；朝貢往往基於君主的個人關係，君主的變更將導致朝貢的變化；戰爭與武力是維繫朝貢的重要工具，朝貢關係可隨時因權力變化而逆轉（呂振綱，2017；張帆、楊瀟，2020）。越南的天下體系與曼荼羅體系兩種層級秩序的結構可參考圖 1，圖中的白色箭頭表示朝貢的方向。左側越南的天下體系認爲朝貢是單向層級制的，周邊蠻夷向越南朝貢，而越南向中國朝

**圖 1**
越南與中南半島國家的朝貢想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中南半島國家的朝貢想像參考呂振綱（2017）對曼荼羅體系的描述繪製而成。

[35] 有些文獻將其譯爲「曼陀羅」或「曼達拉」。
[36] 有些文獻將其譯爲「納加拉」。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貢；右側曼荼羅體系的朝貢卻是多元的，外部圈層不僅要向核心圈朝貢，也向其他重疊的核心圈朝貢，朝貢關係容易隨時因爲權力變化而逆轉。

自認「文獻之邦」的後黎認爲其德性與文化與唐、宋等中原王朝比肩，視周邊尚未漢化的邦國爲蠻夷（Reid, 2015, pp. 179-183）。分處不同文化脈絡的後黎與周邊國家對朝貢的看法也存在顯著差異，前置共性稀少，較難建立並確認共性。更爲重要的是，這些中南半島國家內部的權力變動非常頻繁，且國王對地方的掌控能力有限，即便國家首領與後黎協商一致，地方長官也可能違反命令進攻或劫掠越南邊境，甚至推翻舊首領成爲新領袖，較難與越方確認並維繫共性，雙方身份的安排往往藉由強迫方式短暫達成。

## 二、越南與周邊小國的關係

根據《大越史記全書》與《欽定越史通鑑綱目》的記載，曾與後黎交往的周邊小國共有占城、哀牢、羅羅斯、暹羅、盆蠻（鎮寧）、爪哇、南掌等國，其中占城、哀牢的互動比較頻繁。[37] 除了直接與後黎建立朝貢關係的上述各國，南部的眞臘還與黎中興朝的阮主建立過朝貢關係。

### (一) 占城

占城位於現在的越南中南部，曾經使用過林邑、環王、占婆等國名，後來因占婆國王所居住的城市被稱作占城。[38] 占城曾與前黎、李、陳、胡等交戰，甚至有互相攻入對方都城的紀錄。後黎朝早期，占城與後黎分別在 1434、1444、1445、1446 年爆發大規模軍事衝突，直到 1446 年的戰爭結束後，兩國才出現構建共性的基礎。

1446 年（明正統 11 年），後黎以占城屢次入侵化州爲由派遣程眞等「如明奏占城事」，同時安排黎受等率軍進攻占城。當年夏天，後黎軍隊俘

37 羅羅斯在黎太宗時期進貢一次，爪哇國在黎聖宗時期遣使一次，南掌在黎中興朝顯宗時期進貢一次，之後便再無相關紀錄。暹羅國則在黎太宗時期有過三次朝貢紀錄，其中一次是商船朝貢，還有一次朝貢則被後黎朝拒絕。盆蠻則在後黎朝前期成爲越南的一部分，盆蠻首領則被後黎朝視爲內部的土官而非外邦國主。

38 詳情可參閱《明史・占城傳》。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獲占城國主貢該並將其帶回後黎都城，在太廟舉辦盛大的獻捷儀式。幾乎在戰爭進行的同時，占城以前的統治者派遣制咎等到後黎「奉表稱臣」，請求後黎冊封他爲占城國王，試圖創造基於朝貢的即興共性。後黎對占城爲其安排的天朝上國的角色滿意，同意建立與占城的朝貢關係。此後的二十年間，後黎透過遣使斥責的方式要求占城更正行爲，兩國間沒有戰爭的記錄，被俘獲的占城君主貢該還被允許參與後黎舉辦的外交活動。[39]

1470 年，占城出兵攻擊後黎。此時占城政局已變，槃羅茶悅殺害後黎認可的占城國主後自立爲王，又將王位傳給弟弟槃羅茶全。槃羅茶全繼位後「不修職貢」，「凌辱朝使」，還親自率軍劫掠化州等後黎城鎮，兩國面臨共性危機。當年冬季，黎聖宗下詔親征占城。在「布告天下」的詔書中，後黎指責占城不僅「攻劫化州」，還不遵守朝貢本分，甚至到明朝投訴越南「自尊南國之帝皇」，「作狐媚於燕京」。奏告太廟時，黎聖宗也將出兵的原因歸咎於占城屢次挑釁作爲天朝的越南，不得不效仿古今聖王「恭行天罰」。[40] 數月後，後黎軍隊攻入占城首都闍槃城，占城國王槃羅茶全兵敗被俘。[41]

槃羅茶全被俘獲後，逋持持控制了占城的部分土地，[42] 希望基於之前的朝貢脈絡構建與後黎的共性。基本平息內部戰亂後，逋持持以藩臣的名義向後黎入貢並請求冊封，黎聖宗滿意對雙方身份的確認，冊封逋持持爲占城國王，並同時冊封原屬占城的華英與南蟠國王。此後，越南與占城再沒有發生大規模戰爭，僅在 1509 年發生過槃羅茶全後代的叛亂案，但很快就獲得解決。

---

39 詳情可參閱《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十七》、《大越史記全書・卷之十一・黎皇朝紀・仁宗宣皇帝》。

40 出自《大越史記全書・卷之十二》。

41 《大越史記全書》記載，黎聖宗曾在翻譯的幫助下與被俘的槃羅茶全交談，還交代後黎官員善待作爲「國主」的槃羅茶全，不可使其「窘迫」。槃羅茶全在被押解回越南的途中過世，黎聖宗安排軍官按照占城習俗火葬了槃羅茶全，但將他的頭顱帶回後黎的太廟。

42 逋持持，明朝的歷史資料也寫作「齊亞麻弗菴」或「齊亞麻勿庵」，是槃羅茶全的親戚。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 (二) 哀牢

越南典籍中的「哀牢」並非雲南附近的哀牢古國，而是位於現寮國附近瀾滄王國的一支。十四世紀，越南陳朝曾出兵哀牢，並在義安附近留下摩崖紀功碑文。碑文記載，陳朝皇帝「受天眷命奄有『中夏』」，各國爭相朝貢，唯哀牢不服王化，越南因此出兵懲罰。越南對哀牢的身份定位是恭敬的朝貢國，如若對方拒絕實踐，就應嚴懲。

後黎對哀牢的角色想像與陳朝類似，對願意歸順並向後黎朝貢的哀牢部落比較友善，甚至願出兵幫助處理其內部的叛亂，實現中國傳統的「興滅繼絕」，以鞏固雙邊共性。如黎太宗曾在哀牢首領昆孤的請求下，出兵援助。但當哀牢各部落不服從後黎，拒絕朝貢甚至襲擾劫掠後黎邊境城市時，後黎立刻連續採取「權力平衡」措施。1432、1435、1437、1439、1440、1441、1467、1479 年，後黎都因哀牢「不修職貢」或襲擾邊境，而採取大規模的軍事進攻。

黎中興朝後，後黎軍事實力大不如前，且面臨內部分裂等重大問題。1564 年，後黎與哀牢恢復了中斷多年的朝貢，並於 1571 年實現和親通婚，建構並確認了兩國基於朝貢與和親的共性。此後越南的歷史典籍雖然沒有兩國發生戰爭的紀錄，但兩國至少在 1700、1706、1756 年因朝貢問題有過三次分歧。面對分歧，後黎並沒有像黎初朝那樣動輒出兵，而藉由遣使協商等關係平衡方式「恩義懷遠」。

## (三) 真臘

眞臘是中南半島的印度化古國，位於現在的柬埔寨一帶，靠近越南南部。[43] 黎中興朝時，越南雖然名義上由後黎皇帝統治，但實際上分爲南北兩部分，後黎皇帝居住在北部，實際政局由鄭主控制，南部則由阮主控制。明泰昌年間，南部的阮主不再向北部的後黎皇帝進貢與上繳賦稅，並拒絕與鄭主共同承擔向明朝進貢的負擔，越來越成爲一個獨立的政權。在此期間，阮主開始與周邊國家交往，而地理位置最接近的眞臘成爲阮主的重要

43 詳情可參閱《眞臘風土記》。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交往對象。

1658 年，阮主與眞臘爆發軍事衝突並獲勝。戰後，阮主與眞臘就朝貢等角色安排達成一致，冊封眞臘國王爲藩臣，眞臘從此歲貢阮主。[44] 此後，眞臘與阮主維持定期朝貢，當眞臘遭遇外國入侵時，阮主也會出兵援助。如 1674 年眞臘君主匿嫩以暹羅入侵爲由請求阮主救援，阮主認爲「匿嫩藩臣有急，不可不救」，立刻命令阮揚林等「將兵救眞臘」。[45] 兩國僅在 1699、1705、1776 年發生軍事衝突，其中 1705 年的衝突是應眞臘國王的請求派兵處理內部叛亂。1699 年與 1776 年的戰爭，則是因爲眞臘襲擾邊境和不修職貢，拒絕與阮主確認共性而導致的懲罰戰爭。

## 三、小結

後黎與占城、哀牢，以及阮主與眞臘等國的交往案例顯示，越南確實更難與前置共性稀少的國家建立並確認共性。但一旦確認共性，雙方也可通過關係平衡方式處理糾紛，相處也比較和平。後黎與占城自 1446 年後，僅在 1470 和 1509 年發生戰爭，而每次戰爭都涉及占城的內部叛亂以及隨之產生的領導層的變化。當後黎與哀牢，南方阮主與眞臘確認共性後，越南甚至願意主動出兵幫助哀牢與眞臘平復內部的叛亂，戰爭的次數也顯著減少，本文的假說 2 由此得到驗證。

越南在面對權力不同的大小國家時，確實會採取不同的政策。面對實力更強大的中國，後黎與明的數次利益糾紛以及和清的領土與邊境等糾紛都以關係平衡方式解決，但是在面對周邊小國時，後黎卻更常採用權力平衡方式。當占城劫掠邊城，哀牢與眞臘不修職貢，後黎常採取戰爭手段，而當明清的土官侵擾甚至劫掠越南邊境城市時，後黎卻採取遣使上書與會勘等方式解決。同樣是處理不修職貢的哀牢，實力強大的黎初朝在 1432 到 1479 年間至少採取了 8 次軍事行動懲罰哀牢，而在實力較弱的黎中興朝時期，後黎卻採取「恩義懷遠」的方式以關係平衡方式解決。後黎對明清和周邊小國的不同做法，以及實力不同的後黎對哀牢的表現，說明本文研究

[44] 出自《大南實錄・第一冊・前編》第四、五卷。
[45] 詳情可參閱《大南寔錄・大南寔錄前編・卷五》。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假說 3 可以成立。不過這並不意味著越南不會對大國採取權力平衡的抗衡姿態。尚未確認與大國的共性時，越南確曾抗衡中國，並且對明、清採取了不同策略。與清朝相比，越南不僅如假說 1 所驗證優先確認與明的關係，且在尚未確認共性時積極構思並遵守與明的共性而相對抗拒與清的交往。究其原因，或可歸結於前置共性的差異。與明相比，後黎與清在語言、文字、習俗存在顯著差異，很難想像與薙髮易服的滿清建立基於朝貢的共性。後續研究或可關注與之類似的越南陳朝與元、明的交往過程，進一步探討影響權力平衡或關係平衡的具體條件。

## 陸、結論

藉由對越南後黎朝與周邊國家的交往研究，作者們認爲後黎朝時期的越南透過「關係」與「權力」，構建了不同於中國的天下體系，同時扮演了「中國天下」的參與者，和「越南天下」的核心。在越南的天下體系中，越南雖自認與中國平等地「各帝其國」，但在實際交往中卻藉由朝貢等實踐，形式上承認中國天下的層級名分。當與中國發生衝突時，越南可以基於兩國既有的制度與慣例，尋找與中國的共性，創造雙方都可接受的角色，並藉由對禮儀身份的實踐，重建雙邊穩定關係。面對中南半島的印度化小國時，越南雖然也可構建和確認彼此的共性，甚至可以出於共性的關係考量而馳援小國，但當面臨共性危機或無法確認共性時，越南更常使用權力平衡的方式，迫使小國接受越南的優越地位。

具有歷史認知的國際關係研究的目的，不是要證明現代理論無法全然解釋古代案例，而是希望藉由歷史案例反思現代理論，對當代問題有更佳的解釋（吳玉山，2018，頁 10-17）。雖然本文所討論的前現代東亞國家間「共性」，與儒家文化和禮儀息息相關，但共性不必是儒家或東亞的，包括游牧、遊獵政權的文化，與可汗、蒙旗等制度，東亞古代各類異質並存國家都能在既有脈絡下，嘗試尋找身份共識的基礎，並在此基礎上發展與確認共性（張登及，2010，頁 47-48）。對當代越南而言，越南與中國的共性可以是非儒家的，例如基於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歷史經驗等脈絡的「同志加兄弟」的角色設定，與寮國和柬埔寨的共性也可基於共同的殖民和鬥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經驗。儘管在南海等議題與中國存在分歧，但現代越南仍能藉由實踐「好鄰居」、「好朋友」、「好同志」、「好夥伴」的角色以維持關係的可預期性，甚至響應了北京的訴求，將兩國關係由全面戰略合作夥伴（Đối tác chiến lược toàn diện）提升至中越命運共同體，以回應中國對越南的角色要求。[46] 或也因此，越、中邊界問題雖不少於中、菲海上爭端，但經由兩個社會主義政權共性的確認，紛爭較易得到控管。而與柬埔寨和寮國交往時，現代越南則在共同經驗的基礎上構建了越寮、越柬特殊關係（Quan hệ đặc biệt），透過常態化政府間雙邊合作委員與三國領導人會晤，推進三黨、三國關係的發展。[47]

由於關係中的雙方無論權力大小都可以創造或改變共性，因此對國際關係的中小行爲體而言，關係平衡的共性途徑，實際賦予了他們較多的自主性。中小行爲體不必只經由內外部平衡，去冒險以高成本行爲改變權力對比，還可選擇在既有脈絡下尋找並確認與其他行爲體的共性，並藉此穩定與他國的互動，甚至要求較強大一方做出妥協。當然，「關係平衡」並不是萬能的。無論大國一方或小國一方，只要關係中的任何一方認爲對方的行爲嚴重違背既有了共性，關係平衡就遭受挑戰。如果未能尋回共性，失敗的關係平衡甚至會遭致導致更嚴重的衝突。黎季犛劫殺陳添平所導致的明入越戰爭便是典型案例。對於漢、唐中國的研究也發現，當與周邊國家有衝突時，與漢、唐共性更多的國家，可能受到更嚴重的報復。

歸結言之，關係平衡與「共性」的研究，不僅有助於理解國際政治的中小行爲體的政策選項與自主性，也提示國家需謹慎經營不對稱關係間的「共性」，避免因關係平衡嚴重失靈，又無法有效運作權力平衡，導致更加嚴重的危機。

---

46 關於中越命運共同體概念，越南官方的越文譯文是「未來共享共同體」（cộng đồng chia sẻ tương lai），參閱中央社 2023 年 12 月 24 日報導（邱國強，2023）。

47 2025 年 2 月 22 日，越共總書記蘇林與總理范明政在胡志明市與柬埔寨、寮國的政黨領袖與政府總理舉行會晤，強調一國的事情也是其餘兩國的事情，「三黨三國始終將越柬老三黨三國和三國人民傳統友誼放在第一位等的一貫政策」。詳情可參閱越通社報導（20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參考書目

于向東、成思佳（2020）。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中國古代中越關係史研究述略。**中華文化論壇**，(2)，17-33。[Yu, X.-D. & Cheng, S.-J. (2020).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Vietnam relations since 1980s. *Journal of Chinese Culture*, (2), 17-33.]

山本達郎（2020）。**安南史研究**（畢世鴻、瞿亮譯）。商務印書館。（原著出版於1950）[Yamamoto, T. (2020). *The study of Vietnam history* (Bi, S.-H. & Qu, L. Trans.). Commercial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0)]

王小紅、何新華（2014）。**天下體系：一種建構世界秩序的中國經驗**。光明日報出版社。[Wang, X.-H., & He, X.-H. (2014). *Tianxia tixi: Yizhong jiangou shijiezhixu de zhongguo jingyan.* Guangming Daily Press.]

王明珂（2018）。**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Wang, M.-K. (2018). *Reflectiv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graphical reflection*. Shanghai People Press.]

王德權（2006）。在東京與京都之外：渡邊信一郎的中國古代史研究。**新史學，17**(1)，143-202。[Wang, T.-C. (2006). Beyond Tokyo and Kyoto: A study of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by Watanabe Shinichirō. *New History*, *17*(1), 143-202.]

左榮全（2014）。略論越南亞朝貢體系——兼論與東亞朝貢體系之異同。**南洋問題研究**，(2)，93-99。[Zuo, R.-Q. (2014). Discussion on the sub-tributary system of Vietnam.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 93-99.]

甘懷眞（2018）。從冊封體制看漢魏時期的國際關係。載於吳玉山（編），**中國再起：歷史與國關的對話**（頁 85-110）。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Kan, H.-C. (2018). Cong cefeng tizhi kan Hanwei shiqi de guoji guanxi. In Wu, Y.-S. (Ed.), *Resurgence of China: A dialogue between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85-110).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TU.]

甘懷眞（2024）。**天下的誕生：巫教、上帝與儒教國家**。三民書局。[Kan, H.-C. (2024). *The birth of Tianxia: Shamanism, god, and the Confucian state*. Sanmin.]

石之瑜（2021）。**國際政治學的關係理論與中國**。翰蘆。[Shih, C.Y. (2021). *Guoji zhengzhixue de guanxi lilun yu zhongguo*. Hanlu.]

石之瑜、林廣挺、湯名暉（2019）。科學的國際「關係性」——天下、軟實力與世界秩序。**國際政治研究**，(3)，38-63+34。[Shih, C.Y., Lin, G.-T., & Tang, M.-H. (2019). Theorizing rela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ianxia, soft power and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orld order.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 38-63+34.]

朴炳培（2022）。敵對的朝貢體系：遼金與高麗關係。**政治科學論叢**，(92)，61-107。[Park, B.-B. (2022). The hostile tributary syste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ao/Jin and Goryeo.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92), 61-107.]

吳玉山（2018）。歷史與國關。載於吳玉山（編），**中國再起：歷史與國關的對話**（頁 3-22）。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Wu, Y.-S. (2018). Lishi yu guoguan. In Wu, Y.-S. (Ed.), *Resurgence of China: A dialogue between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3-22).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TU.]

呂振綱（2017）。曼陀羅體系：古代東南亞的地區秩序研究。**太平洋學報，25**(8)，27-39。[Lü, Z.-G. (2017). Mandalic system: Study on the regional order of ancient Southeast Asia. *Pacific Journal*, *25*(8), 27-39.]

李揚帆（2015）。「中華帝國」的概念及其世界秩序：被誤讀的天下秩序。**國際政治研究**，(5)，28-48。[Li, Y.-F. (2015). The concept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world order: A misinterpreted Tianxia order.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5), 28-48.]

李揚帆（2016）。**被誤讀的天下秩序**。北京大學出版社。[Li, Y.-F. (2016). *Bei wudu de tianxia zhixu.*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汪衛華（2022）。拆解過程追蹤。**國際政治科學，7**(2)，156-178。[Wang, W.-H. (2022). Chaijie guocheng zhuizong.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7*(2), 156-178.]

周功輝、黃瓊萩（2018）。歷史後見之明中的新敘事：從越南視角出發的中越關係分析。載於吳玉山（編），**中國再起：歷史與國關的對話**（頁 311-331）。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Chu, C.-H., & Huang, C.-C. (2018). Lishi houjian zhiming Zhongde Xinxushi: Cong Yuenan shijiao chufa de Zhongyue guanxi fenxi. In Wu, Y.-S. (Ed.), *Resurgence of China: A dialogue between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311-331).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TU.]

邱國強（2023）。中越共建命運共同體？學者：越南態度保留各自表述。**中央通訊社**，12 月 14 日。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312140131.aspx [Chiu, K.-C. (2023). Zhongyue gongjian mingyun gongtongti? Xuezhe: Yuenan taidu baoliu gezi biaoshu. *Central News Agency*, December 14.]

段紅雲（2021）。傳統「天下體系」下的清雍正「安南勘界案」。**中國邊疆史地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究**，(31)，26-38+213。[Duan, H.-Y. (2021). The “Annam border demarcation case” during the Yongzhe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under the traditional “under heaven system”.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31), 26-38+213.]

段超、高元武（2020）。從「夷夏之辨」到「華夷」一體：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的思想史考察。**中南民族大學學報**，(5)，1-8。[Duan, C. & Gao, Y.-W. (2020). From “Difference between Yi and Xia” to integration of “Hua and Yi”: A survey of history of thoughts on formation of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5), 1-8.]

徐波（2017）。對古代東亞朝貢體制的再思考。**國際政治研究**，(3)，85-102。[Xu, B. (2017). The tributary system in ancient East Asia revisited.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 85-102.]

徐建新（2007）。天下體系與世界制度：評《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國際政治科學**，(10)，113-142。[Xu, J-X. (2007). Tianxia tixi yu shijie zhidu: ping “tianxiatixi shijie zhidu zhexue daolun”.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0), 113-142.]

時殷弘（2011）。武裝的中國：千年戰略傳統及其外交意蘊。**世界經濟與政治**，(370)，4-33。[Shi, Y.-H. (2011). China in arms: The millennial strategic traditions and their diplomatic implications.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370), 4-33.]

秦亞青（2018）。世界政治的關係理論。**世界政治研究**，(2)，30-46。[Qin, Y.-Q. (2018).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Studies*, (2), 30-46.]

高明士（2008）。**天下秩序與文化圈的探索：以東亞古代的政治與教育爲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Kao, M.-S. (2008). *Tianxia zhixu yu wenhuaquan de tansuo: yi dongya gudai de zhengzhi yu jiaoyu wei zhongxin*. Shanghai Guji.]

張帆、楊瀟（2020）。尼加拉體系：理解東南亞國際關係的新視角。**世界經濟與政治**，(11)，89-116。[Zhang, F. & Yang, X. (2020). A Negara system: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11), 89-116.]

張其賢（2009）。「中國」與「天下」概念探源。**東吳政治學報**，27(3)，169-256。[Chang, C.-S. (2009). The formation of two key concepts: “Zhongguo” and “Tianxia”.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7*(3), 169-256.]

張哲挺（2023）。**十八至二十世紀越南文人中華觀之流變**。白象文化。[Chang, C.-T. (2023). *The evolution of the views on Chunghua of the Vietnamese literati from*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the 18th to the 20th century*. Elephant White.]

張崑將（2015）。越南「史臣」與「使臣」對「中國」意識的分歧比較。**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12**(1)，167-191。[Chang, K.-C. (2015). Comparison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as expressed by "official Vietnamese historians" and "Vietnamese envoys". *Taiw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2*(1), 167-191.]

張登及（2010）。清代蒙古盟旗制度建立的意涵：一種『天下體系』觀念下的國際政治制度創新。**蒙藏季刊，19**(4)，34-49。[Chang, T.-C. (2010). Qingdai menggu mengqi zhidu jianli de yihan: Yizhng "tianxia tixi" guannia xiade guoji zhengzhi zhidu chuangxin. *Mongolian & Tibetan Quarterly*, *19*(4): 34-49.]

張登及（2020）。國際秩序的未來。載於張亞中、張登及（編），**國際關係總論（第五版）**（頁 541-570）。揚智文化。[Chang, T.-C. (2020). Guoji zhixu de weilai. In Chang, Y.-C. & Chang, T.-C.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th)* (pp. 541-570). Yangzhi.]

張登及（2023）。郡縣之？冊封之？中國若干王朝之朝鮮半島政策初步比較。載於吳玉山、張登及（編），**大國逐霸・小國圖存：東亞歷史與國關理論**（頁 213-270）。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Chang, T.-C. (2023). Junxianzhi? Cefengzhi? Zhongguo ruogan wangchaozhi Chaoxian bandao zhengce chubu bijiao. In Wu, Y.-S. & Chang, T.-C. (Ed.), *Great powers pursue hegemony, small countries struggle to survive: history in East Asia and IR theories* (pp. 213-270).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TU.]

張登及、金世勛（2017）。朝貢體系下中小國家的避險行爲：朝鮮半島的兩個歷史案例初探。**政治學報，63**，63-79。[Chang, T.-C., & Kim, S. (2017) Hedging in the tributary system: Case studies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3): 63-79.]

張登及、陳瑩羲（2012）。朝貢體系再現與「天下體系」的興起？中國外交的案例研究與理論反思。**中國大陸研究，55**(4)，89-123。[Chang, T.-C., & Chen, Y.-H. (2012). Revitalization of the tribute system and the rise of the "Under-Heaven system"? case studies and reflections on China's diplomacy. *Mainland China Studies*, *55*(4), 89-123.]

莊國土（2005）。略論朝貢制度的虛幻：以古代中國與東南亞的朝貢關係爲例。**南洋問題研究**，(3)，1-8。[Zhuang, G.-T. (2005). On the illusiveness of tributary system: A case of the tributary relations between ancient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3), 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莫翔（2017）。**「天下－朝貢」體系及其世界秩序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Mo, X. (2017). *"Tianxia-chaogong" tixi jiqi shijie zhixuguan.*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郭振鐸、張笑梅（2002）。**越南通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Guo, Z.-T., & Zhang, X.-M. (2002). *Yuenan tongshi*.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陳英德（2015）。**印度文化在占婆的傳播及影響**〔未出版之博士論文〕。雲南大學。[Tran, A.-D. (2015). *The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Indian culture in Champa*.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Yunnan University.]

陳納慧（2022）。國際關係學的「關係轉向」：本體論的演進與方法論意義。**國際政治研究**，(1)，37-61。[Chen, N.-H. (2022). The relational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Seeking progress in ontology and methodology.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 37-61.]

陳康令（2017）。**禮和天下**。復旦大學出版社。[Chen, K.-L. (2017). *Li he tianxia.* Fudan University Press.]

陳鴻瑜（2019）。**越南史：史記概要**。台灣商務印書館。[Chen, H.-Y. (2019). *A history of Vietnam.* The Commercial Press, Taiwan.]

費海汀（2019）。政治科學中的歷史方法：以比較歷史分析爲例。**北大政治學評論**，(2)，223-248。[Fei, H.-T. (2019). Historical method in political science: From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PKU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 223-248.]

越通訊（2025）。越老柬加強三國團結、提高合作成效、推動三國關係邁向新發展階段。**越南通訊社**，2 月 22 日。https://zh.vietnamplus.vn/article-post235924.vnp [VietnamPlus. (2025). Yuelaojian jiaqiang sanguo tuanjie, tigao hezuo chengxiao, tuidong sanguo guanxi maixiang xin fazhan jieduan. *Vietnam Plus*, February 22.]

黃瓊萩（2016）。從權力不對稱結構的視角分析南海主權爭議發展的條件與因素。**展望與探索**，**14**(3)，105-110。[Huang, C.-C. (2016). An analysis of the conditions and factors of the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asymmetry. *Prospect & Exploration*, *14*(3), 105-110]

楊仕樂（2017）。東亞朝貢體系的實驗檢證：朝鮮的案例研究 1618-1637。**問題與研究**，**56**(1)，53-79。[Yang, S.-Y. (2017).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east Asian tribute system: A case study of Korea 1618-1637. *Wenti yu Yanjiu, 56*(1), 53-79.]

楊仕樂（2018）。崛起中國的權力政治或文化認同：歷史上中韓關係的實證檢驗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368-1449)。**遠景基金會季刊，19**(1)，109-156。[Yang, S.-Y. (2018). Power politics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China's rise: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Chinese-Korean relations 1368-1449. *Prospect Quarterly*, *19*(1), 109-156.]

萬曉（2017）。朝貢的名實與朝貢之外的東亞──分類框架、案例舉隅與研究建議。**國際政治科學，**(7)，63-104。[Wan, X. (2017). Chaogong de mingshi yu chaogong zhiwai de dongya: fenlei kuangjiang, anli juyu yu yanjiu jianyi.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7), 63-104.]

葛兆光（2015）。對「天下」的想像：一個烏托邦想像背後的政治、思想與學術。**思想，29，**1-56。[Ge, Z.-G. (2015). Dui "tianxia" de xiangxiang: yige wutuobang xiangxiang beihou de zhengzhi, sixiang yu xueshu. *Reflexion, 29*, 1-56.]

葛兆光（2017）。**歷史中國的內與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Ge, Z.-G. (2017). *Lishi zhongguo de neiyuwai*. CUHK Press.]

榮劍（2023）。誰的天下？「天下體系」批判。**思想，46，**263-309。[Rong, J. (2023). Shuide tianxia? "tianxia tixi" pipan. *Reflexion, 46*, 263-309.]

趙汀陽（2016）。**天下的當代性：世界秩序的實踐與想象**。中信出版社。[Zhao, T.-Y. (2016). *A possible world of all-under-heaven system.* CITIC Press.]

趙汀陽（2018）。天下究竟是什麼？──兼回應塞爾瓦托・巴博納斯的「美式天下」。**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7-14。[Zhao, T.-Y. (2018). Tianxia jiujing shishenme? Jian huiying Salvatore Babones's "meishi tianxia". *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1), 7-14.]

劉浩然（2018）。社會科學比較研究方法：發展、類型與爭論。**國外社會科學，5**(1)，122-133。[Liu, H.-R. (2018). Comparative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s: Development, controversies and categories. *Social Sciences Abroad*, *5*(1), 122-133.]

鄭永常（1994）。論明宣宗棄守安南。**歷史學報，**(20)，199-227。[Cheng, W.-S. (1994). Lun mingxuanzong qishou Annam. *Bulletin of History Departmen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20), 199-227.]

賴淙誠（2004）。**清越關係研究－以貿易與邊務爲探討中心（1644-1885）**〔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Lay, C.-C. (2004). *Qingyue guanxi yanjiu: yi maoyi yu bianwu wei tantao zhongxin (1644-1885)*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羅樂然（2022）。綠鴨朱鳶千萬里－明清時期安南、朝鮮赴華使節的文化交流與競爭。**清華學報，52**(3)，551-590。[Law, L.-Y. (2022). A thousand miles between th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green duck and the red falcon: The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envoys of Annam and Chosŏn in the Ming-Qing period. *Tsing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52*(3), 551-590.]

蘇軍瑋（2023）。漢唐崛起對周邊的「衝突－回應」模式。**政治科學論叢**，(96)，53-92。[Su, C.-W. (2023). The "challenge-reaction" pattern in the rise of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96), 53-92.]

Anderson, J. A. (2013). Distinguishing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Three relational equilibriums in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3*(2), 259-280.

Babones, S. (2017). *American tianxia: Chinese money, American power and the end of history*. Policy Press.

Bai, T. (2020). Tian Xia: A Confucian model of state ident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Rossi, I. (Ed.),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and prospects for an inter-civilizational world order* (pp. 969-982).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Baldwin, D. (2013).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 Carlsnaes, T. Risse, B.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73-297). SAGE.

Bell, D. A. (2017). Realizing Tianxia: Traditional values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Wang, B. (Ed.), *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 (pp. 129-146). Duke University Press.

Callahan, W. A. (2007). Tianxia, empire and the world: Soft power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discourse in the 21st century. *British Inter-University China Centre Working Paper Series*, *1*(2).

Chan, T.-D. (2020). From Confucianism to nationalism: Fictive kinship and the making of the Vietnamese. *Asian Studies, 8*(2), 165-183.

Chang, T. (2020). Governing inter-ethnical international order for China: A comparison of Tang's mollification system and Qing's Mongolian banner system. *Asian Ethnicity*, *21*(2), 305-319.

Chang, Y. (2024). Contested sinicization in the Tianxia all-under-heaven: Civilization envy in Vietnam's "principal graduates of the two kingdoms" literary trope, the 15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68*(3), 290-304.

Emirbayer, M. (1997). 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2), 281-3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Gerring, J. (2004). What is a case study and what is it good fo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8*(2), 341-354.

Hobson, J., & Zhang, S. (2022). The return of the Chinese tribute system? Re-view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lobal Studies Quarterly*, *2*(4), 1-11.

Ikenberry, G. J., & Nexon, D. H. (2019). Hegemony studies 3.0: The dynamics of hegemonic orders. *Security Studies, 28*(3), 395-421.

Jackson, P. T., & Nexon, D. H. (1999). Relations before states: Substance, process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3), 291-332.

Johnston, A. I. (1995).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ang, D. C. (2003).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4), 57-85.

Kang, D. C. (2010). Hierarchy and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tribute system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19*(4), 591-622.

Kang, D. C. (2020). International order in historical East Asia: Tribute and hierarchy beyond sinocentrism and eurocentr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4*(1), 65-93.

Kang, D. C., Nguyen, D. X., Fu, R. T.-M., & Shaw, M. (2018). War, rebellion, and intervention under hierarchy: Vietnam-China relations, 1365 to 1841.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3*(4), 896-922.

Kelly, R. E. (2012). A 'Confucian Long Peace' in pre-western 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8*(3), 407-430.

Khong, Y. F. (2013). The American tributary system.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6*(1), 1-47.

Liam, C. K. (2023). Tianxia as anticosmopolitan and protoracial: A case study of late imperial Vietnam. In R. T. Ames, S. Tan & S. Y. H. Yang (Eds.), *Tianx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pp. 39-67).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Meng, W. (2023). From defensive realism to hegemonic stability: Explain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imperial China and the surrounding regimes.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6*(4), 455-475.

Nguyen, C. T. (2023). History repeating itself: Chineseness in premodern Vietnam and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ts influence on contemporary Vietnam's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56*(2), 58-80.

Nguyen, T. M. H. (2019). Application of center-periphery theory to the study of Vietnam-China relations in the Middle Ages.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8*(1), 53-79.

Nguyen, T. M. H. (2021). Tributary activities of Vietnam and Korea with China: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History*, *26*(1), 117-144.

Nguyen, T.-D., & Ho, M.-T. (2019). People as the roots of the state: Democratic elements in the politics of traditional Vietnamese Confucianism. *Journal of Nationalism, Memory & Language Politics*, *13*(1), 90-110.

Pan, C. (2020). Enfolding wholes in parts: quantum holograph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6*, 14-38.

Qin, Y.-Q. (2016).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8*(1), 33-47.

Qin, Y.-Q. (2018).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id, A. (2015).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Critical crossroad.* Wiley-Blackwell.

Seawright, J., & Gerring, J. (2008). Case selection techniques in case study research: A menu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option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61*(2), 294-308.

Shih, C.-Y. (2017). The relational turn east and west from Chinese Confucianism to balance of relationships. *Kor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1*(6), 107-127.

Shih, C.-Y. (2024). *Relations and roles in China's internationalism: Rediscovering Confucianism in a pluriversal world*. SUNY Press.

Vu, T. (2016). State formation on China's southern frontier: Vietnam as a shadow empire and hegemon. *HumaNetten*, (37), 39-65.

Vuving, A. (2009). Operated by world views and interfaced by world orders: Traditional and modern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In Anthony Reid and Zhang Yangwen (Eds.), *Negotiating asymmetry: China's place in Asia* (pp.73-92).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Wang, M. (2012). All under heaven (tianxia): Cosmological perspectives and political ontologies in pre-modern China.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2*(1), 337-3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ang, Y.-K. (2010).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ang, Y.-K. (2012). Managing regional hegemony in historical Asia: The case of early Ming Chin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2), 129-153.

Wang, Y.-K. (2013). Explaining the tribute system: Power, Confucianism, and War in medieval east Asi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3*(2), 207-232.

Womack, B. (2006).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Yu, I. (2009). Vietnam-China relations in the 19th century: Myth and reality of the tributary system.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History*, *1*(6), 81-117.

Zhang, F. (2013). The rise of Chinese excep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2), 305-328.

Zhang, T. (2002).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Traditional and present features. *Comparative Strategy*, *21*(2), 73-90.

西嶋定生（2002）。**東アジア世界と册封体制**。岩波書店。[Nishijima, S. (2002). *Dong yaxiya shijie he cefeng tizhi*. Iwanami Shoten.]

渡辺信一郎（2003）。中國古代の王權と天下秩序。校倉書房。[Watanabe, S. (2003). Zhongguo gudai de wangquan he tianxia zhixu. Azekura Shobo.]

鈴木中正（1975）。黎朝後期の清との関係。載於山本達郎（編），**ベトナム中国関係史：曲氏の抬頭から清仏戦争まで**（頁 405-492）。山川。[Suzuki, C. (1975). Vietnam's relations with the Ch'ing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Le dynasty. In Yamamoto, T. (Ed.),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Vietnam and China: From the rise of Khuc family to the Sino-French War* (pp. 405-492). Yamakawa Shuppansha.]

藤原利一郎（1975）。黎朝前期の明との関係。載於山本達郎（編），**ベトナム中国関係史：曲氏の抬頭から清仏戦争まで**（頁 253-332）。山川。[Fujiwara, R. (1975). Vietnam's relations with the Ming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Le dynasty. In Yamamoto, T. (Ed.),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Vietnam and China: From the rise of Khuc family to the Sino-French War* (pp. 253-332). Yamakawa Shuppansh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

# 歷史古籍

| | | |
|---|---|---|
| 《清史稿》 | 《欽定續文獻通考》 | 《殊域周咨錄》 |
| 《皇明祖訓》 | 《明史》 | 《大南寔錄》 |
| 《大越史記全書》 |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 | 《明實錄》 |
| 《眞臘風土記》 | 《明會要》 | 《清實錄》 |

資料來源：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資料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全文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Tianxia's Vietnam and Vietnam's Tianxia:
## An Analysis of Guanxi and Power in the Later Le Dynasty's Foreign Relations*

*Si-yu Chen** & Teng-chi Chang****

## Abstract

Tianxia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ncient East Asia. Whether it is a philosophical concept, a political system or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existing studies on Tianxia focus on China or other major powers, while neglecting other states within the system. The Complete Annals of Dai Viet. According to Vietnam had used Tianxia to refer to the territory it rules, while not fully submitting to China's Tianxia system. It also established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e name of the "Son of Heaven", and punished countries that did not give tribute to Vietnam in a timely manner. In this way, Vietnam was both under Tianxia and the core of its own Tianxia, accepting tribute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also paying tribute to China. How did Vietnam simultaneously manage these Tianxia relationships?

This article examines Vietnam during the Later Le Dynasty, and uses historical data and documentary archives to analyze how Vietnam established and maintained its own Tianxia order through the approaches of balance of power and balance of relationships. The article finds that Vietnam was more likely to find common ground with countries that had more prior resemblances with itself, and once the resemblances were confirmed, both sides tended to prioritize conflicts through the balance of relationships approach. However,

* DOI:10.6166/TJPS.202606_(108).0002
**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E-mail: stevenchenruc@gmail.com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tchang@ntu.edu.tw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hen such resemblances were in crisis or could not be confirmed, Vietnam was more likely to use coercion against weaker countries. These findings not only help us understan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premodern East Asian states, but also help us conceptualize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actors under conditions of power asymmetry in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system.

**Keywords:** Tianxia, Vietnamese Diplomacy,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Balance of Relationships, Tributary Syste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